

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s' Desk

关于中国当代宗教学研究大局的对话

黄保罗, 卓新平

(上海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摘要:本对话于2017年12月18号在北京建国门内大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进行,主要包括:一、影响卓教授个人走上学术道路的家庭背景和相关事件。大学英语专业及其背景知识的学习促使他较早接触了宗教学,并于宗教学敏感的1978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基督教专业,且有机会留学德国攻读博士(1983-1988),所得经验主要是学术视野、研究方法上的脱胎换骨。二、回国之后的研究及成果:1. 辛苦专研出版经历评职称道路,从1993-2018年成为任期最长的担任了25年的副所长和所长。2. 学术研究三部曲:第一步是比较系统地介绍、研究西方宗教学的历史与现状。硕士论文研究现实主义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博士论文就是《当代中西宗教理论比较研究》(China und ihre Bezugnahme zu Religionstheorie des Westens, Peter Lang Verlag, 1988),后又出版《宗教与文化》,《宗教起源纵横谈》《西方宗教学研究导引》。第二步则是集中研究基督教,一研究基督教的历史,二研究基督教思想,三对中国基督教历史的专题研究,出版《圣经鉴赏》《基督宗教论》《当代新教神学》和《当代天主教神学》,《基督教犹太教志》等。第三步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探究》等中国宗教与文化战略问题研究及相关的争议,亦涉及到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发展的关系。3 从个人研究到为整个宗教学研究平台担任组织工作,从1998年担任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开始组织国际及国内学术会议、丛书及刊物出版、宗教学会、学生培养等。如俗称“神仙会”的“中国基督宗教研究年会”(1998-2011),并与许多单位合作,还有国际会议,如在美国、芬兰等。后组织中国社科论坛宗教学分论坛。博士生发表核心刊物论文的压力问题需要反思,并不合理。三、基督教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及期望是什么? 宗教研究的脱敏是中国发展的必需,基督教中国化是其在华生存和发展的必需,大家应该关注和争取落实国家领导人和政策为宗教学的发展所提供的机遇。对宗教学未来的期待,大家可能要更多地关心一下现实,特别是现实社会的宗教研究,而不能只是自己埋头做自己的那种纯学术。如果没有这种好的氛围支持,是做不好纯学术的,甚至根本就做不下去。

关键词:宗教学、敏感、基督宗教、研究平台、现实社会的研究

作者:黄保罗,上海大学特聘教授,赫尔辛基大学东亚学与西方思想研究双博士,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博士后,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www. SinoWesternStudies. com) 和 *Brill Yearbook of Chinese Theology* (www. brill. com/yct) 主编。 paulos. z. huang@gmail. com

卓新平,中国 shehui 科学院学部委员和研究员、中国人大常委,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原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慕尼黑大学博士,宗教学、基督宗教和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专家。专著和主编著作数十本,论文二百多篇。曾任《世界宗教研究》等刊物和多类丛书主编。 Email: zhuoxp@cass. org. cn.

黄保罗(以下简称“黄”):卓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是2017年12月18号,我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想与卓老师做一个对话。目前,我正在中国大陆对汉语学界做基督教研究的著名学者来进行对话,按计划差不多要谈20多人,所谈内容一部分会在我们这个《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上发出来,最后还想把这些访谈合在一起做一个文集,但最重要的是想与此基督教研究领域的学者对话。我想,您们这一代人已在中国的学术界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我就有了这样来进行对话的想法,谈完之后,我们

请录音公司把它整理成文字, 然后给您看, 您再来修改, 也可以增加, 然后我们再加工, 最后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文本。

根据这样一个计划, 我主要是想请您谈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想谈一谈您个人是怎么走上学术这条路的, 也可以追溯一下您个人的家庭教育和求学背景。第二个内容就是想知道您主要做了什么研究? 主要是哪些具体研究? 第三个内容则是针对基督宗教研究来说, 从您的视觉来看, 汉语学界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以及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嘱咐。主要就是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我们可以来自由谈, 谈的时候也可以对其内容加以穿插进行。

一、您个人是怎么走上学术这条路的, 也可以追溯一下您个人的家庭教育和求学背景。

黄: 第一点, 就是想问卓老师您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您个人是怎么最后会走向成为一个学者的呢, 而且还是做宗教这一行研究的。

大学英语专业及其背景知识的学习而接触了宗教学

卓新平 (以下简称“卓”): 我的经历其实也比较简单。我从事宗教研究, 尤其是基督教研究, 也主要是一种文化学术的兴趣使然。这跟我在文革期间上大学的经历有关系, 文革期间曾在 1972 年时一度恢复从高中生中间招收大学生, 即毕业的高中生可以直接上大学。当时也正是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的一段时间, 后来有人把这个时间定为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

黄: 这个是工农兵学员?

卓: 就是招收工农兵上大学的开始。在 1971 年曾有一个试点, 首先清华北大招收, 1972 年开始全面铺开, 那么这一年也招了一些高中毕业生。我一开始是没有这个资格的, 因为当时是推荐, 我们学校推荐的三位大多数在当地都有点社会背景。所以, 我毕业以后先是到一个教师培训班, 属于中专。我们当地那个大学是一个专科学校, 有个英语专修班。由于当时学校开始抓教育质量, 有一个在校学生基本上是个文盲, 因为跟不上而退学, 于是, 我们这个教师培训班所在的师范学校就推荐了一个同学过去, 但是, 这位同学对外语不感兴趣, 而高中毕业生入大学在当时规定只能学三个专业, 一个是外语, 一个是音乐, 再一个是体育。我们当地的这个大专只有外语, 没有音乐和体育专业, 所以, 这个同学后来去而复返, 又回到了原来的教师速成班。此后, 校长就问我愿不愿意去? 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所以, 我说我很愿意去。这样, 我就到了该大专的英专班, 比别的同学晚入校将近三个月。

黄: 这个是在 1972 还是 1971 年?

卓: 是在 1972 年。所以, 我去了以后就一心想把学习赶上去, 开始猛攻外语, 等过了一两个月期中考试, 我竟然在全班也考了个中游。学习上去以后, 压力就来了, 学校有人说这是走白专道路, 这种批评在当时很厉害, 所以, 我也感觉到, 如果仅仅学专业知识的话, 会让人家觉得你就是在走所谓白专道路。我们班上有一位老师是从长沙那边省教育学院下放过来的, 她就对我说, 其实要真正学好一门语言, 就要了解这个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这样的一句话提醒了我, 此后, 就不再是仅仅去学外语专业的知识内容, 而是开始在学校图书馆借文史哲的著作来看, 包括马恩的著作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看的。当时风行读书无用论, 图书馆很少有人问津。当图书馆年终写总结的时候, 图书馆主任还把我借书多写进去了。我那时借了很多书来看, 对知识是如饥似渴。图书馆有些书不让学生借, 于是, 我在周末的时候就找老师借, 那时候还没有实行五天工作制, 星期六下午找老师借书回家, 读一个晚上, 然后读一个白天, 在星期天晚上回到学校时, 就还给老师, 这样又读了很多一般借不到的书, 对自己文史

哲知识方面有很大的提高。在读书中,我根据学习英语的需要而主要是想了解西方思想文化背景,而在这些西方历史文学哲学书籍中有很多都涉及宗教,尤其是有不少关涉基督宗教的因素。所以,应该说,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对这些领域比较感兴趣了。当然,当时还是朦朦胧胧的,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怎么发展,只是对这方面有些兴趣而已。我们大学毕业以后,在农村劳动,锻炼了一年后,分配我留校,留校后马上又让我去农村里继续做农村工作。这样,我又去农村待了两年半,也就是说,前后在农村里共待了三年半,一直到1977年底才回到学校。

1978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基督教专业

卓:我于1977年底到长沙去湖南大学进修,随之亦在湖南师院旁听。这个时候正是“文革”后恢复大学考试,并得到消息说,到1978年还会招收硕士研究生。我当时关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宗教研究所要招收研究生,其中有一个专业方向就是基督教研究。我想,这个专业以前没有,大家都没有学过,而我有英文基础,在研究这一语言的历史文化背景时已经朦朦胧胧对基督宗教方面有点了解,于是,我就报考了这个专业的研究生。可以说,我是从一个学术探索的兴趣而进入宗教研究这一领域的。当时报考的进程还是比较曲折的,我们学校的校长一听说我报考宗教学,而且还是基督教专业的研究生,就把我叫去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按照他的理解,学宗教就是要出家当和尚,而学基督教就是要当洋和尚!然后,学校又把我以调换教师的方式,赶到下面县城的一个中学去代课。在这种情况下,我到中学去后,反而因祸得福,中学的校长和教务处主任了解到我想考研究生的情况以后,当场表态说,我既然现在归他们学校管了,那么,学校就给我放假,让我去准备考试,考完后再来教课。这样,就给了我两个月专门准备考试的时间。知恩图报,笔试考完了,我马上就自己买了一张车票去那个县城中学任教去了,老老实实地给他们学校学生高考外语做准备。这是我进入基督宗教研究开端时的一段插曲,但没想到,外界这种对宗教研究的误解竟会伴随我余生!

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我的导师是赵复三先生,他当时任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后来我去德国留学的时候,他升任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应该说,我们当时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大家都发奋学习,希望能够弥补“文革”导致的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损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1978年新办的,办学没有地方,就借用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教室和宿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晚上自习的人很多,入口处窗户门的玻璃甚至都曾被拥挤的人群所挤破,学生到那儿就是要占座,占座成为当时流行的话语,那么好的学习氛围迄今都让人怀念。当时,我们是开放性的办学模式,老师不是很多,除了专业老师之外,我们经常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听其他文史哲方面的课,尤其是北京大学去的比较多,许多课程如哲学原理、中外哲学史、世界史、逻辑学等都是在北京大学听的大课。在这一听课的过程中,我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了解就跟世界文化的发展、人类文明精神特性的形成等有机结合起来。我对基督教的研究应该说是一种学术性的探讨,自己的兴趣也主要是从学术这个角度来对基督教的发展进行探索。这一研究到2018年对我而言一晃就是40年了,可以说,我这人生的大半辈子基本上都奉献给这一学术研究了。所以,我主要是从事宗教研究,其中很大比重都是基督教研究。

黄:那请您就给我简单地再讲一下您个人的背景。您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吗?或者请您谈谈这个社会背景或气氛。在1971年及1972年的时候,好像社会上的气氛从总体而言就是不好好读书学习,大家都不怎么学习,但您就特别喜欢学习吗?

卓:对,说实话,我们当时就感觉到,知识无用论对我们这一代是一种伤害。所以,在大家都不学的时候,不少人反而会有更大的求知渴望!张铁生交白卷是在我们入校之后,随之就是读书无用论再度风行,高校大概也就那么两三年就又回到过去的状况。这也是为什么会让我们毕业后下放到农村劳动“补课”的原因,结果,我们所学的一点点知识最后都白教白学了。在农村几年,当然对我们研究社会科学也还是很有教益的,对我们社会阅历的增长非常有帮助。

我们家并没有什么基督教的背景,我属于少数民族的土家族,我们的老家文化传统中有一些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也有一些源自原始宗教的民间信仰及习俗。中国大多家庭中都多少留有一些儒家传统的影响,虽然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过去百年对儒家思想多有批判,但中国社会及其基层的家族家庭仍有着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熏染,这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特色之一。

所以,我个人在文化倾向上也多多少少、至少是间接地留有一些儒家思想因素。如果说中国人跟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关联,应该说是儒家思想对我们产生了主要影响,但也有部分的道家思想留存,即儒道对我们的影响是大一点。在儒道方面,虽然当年考研究生也有这些专业,但是他们要求考生的古汉语要比较好,而研究基督教这个世界性宗教则要求外语比较好。我是学外语的,所以,就选择了基督教这一研究专业。由于儒道这种传统的熏染对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有影响,所以,我在研究基督教的过程中也一直非常关注儒道的发展,有时也进行一些与基督教比较对照的研究。所以,我们研究基督教,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封闭性的单独研究,而是进行了不同宗教的比较研究,有更宽阔的视野。

黄:对我自己而言,后来我反思我自己的学术经历,发现也是儒家对我的影响较大,这还是超过我的想象的。可能是在我上学之前或者我的家庭中,从自己的父母、祖父母那儿就不知不觉地都受到这种影响,必须承认这一事实。

我再接着问:您后来到了中国社科院学习,当时赵复三先生是您的导师,他也是副所长吧?当时的所长是任继愈先生吗?还是谁?

卓:当时我们研究所的所长是任继愈先生,赵复三先生是副所长,我们所在的基督教研究室也是赵复三先生负责。

黄:还有,当时属于您的老师辈的,还有哪些人?

卓:我们这个专业研究从我们研究所本身来讲,研究所主要负责人是任继愈先生,任继愈是儒佛道三教研究专家,主讲佛教和道教课程,也上中国哲学课、古汉语课,我们都听过这些课程。另外,还有一个黄心川先生,也是副所长,他在学术上是一个杂家,儒释道、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宗教哲学等都比较通,知识渊博,宗教研究经验也非常丰富。我们也听过他的课。赵复三先生则主要是讲基督教的历史,对犹太教、西方思想文化、古今哲学都很有造诣。另外,我们后来还请了高望之先生,他后来是我们研究室的主任。他是研究世界历史的,主要是给我们上犹太教的课程。在伊斯兰教方面则有金宜久先生,他是讲世界伊斯兰教的课程。在佛教方面还有郭朋老师,道教方面有钟肇鹏老师,讲宗教学理论和无神论历史则有吕大吉老师,当时牙含章先生则专讲中国无神论。此间徐梵澄先生也从印度回到中国,在我所工作,可惜没有开课。我们这个专业的课重点还是研究基督教。在北京大学,我旁听了世界史的课程,主要是朱龙华老师讲课,他的世界史课讲得非常好、非常生动,我比较喜欢听他的课。在西方哲学史课程上,我听过任华老师的大课。后来所里请北大老师专门给我们讲西方哲学史,讲课老师比较多,包括朱德生、陈启伟等老师。当时北大哲学系或哲学研究所的课,至少有一半老师的课程我们都听过。当然主要是听研究西哲的课,比较而言,中哲的课可能听的少一些。另外,我们还听了中国人民大学麻老师的逻辑学课程,主要讲形式逻辑。我当时对于各种知识是如饥似渴,来回奔波在北京师大、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之间,关注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并时常来建国门的研究所内听课,去所里设在白云观的图书馆借书。记得赵复三老师亲自带我们在图书馆找书、借书。那时社科院的研究生院让我们继续补习英语,还请了新华社的郑老师给我们讲新华社电文稿,请了傅惟慈先生给我们讲翻译课,还请到当时社会上比较有影响的王佐良先生给我们讲大课。我还曾选修过法语课。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跟宗教界有一些联系,例如我们这个专业就有圣经研究方面的课,当时是请北京市基督教会的阚学卿、石泽生两位牧师开的课。另外上海的郑建业先生对我的专业方向也有所关注,是我的外聘导师,我也曾去上海请他做相关指导。所以说,研究所当时就是开放性办学,

涉及许多学科，上课的老师也是非常之多，这对我们来说极有好处，开阔了我们的学术视野。除此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开了一些大课，让我们去听，这些课基本上都是名家来讲，如于光远、唐弢、邢贲思、许涤新等人的课，基本上都挤满了听众。我记得当时讲《资本论》的那个田光老师讲得非常细、非常专，听起来几乎就像是章句之考。就我们所的专题讲座而言，任继愈所长还专门请李泽厚先生来我们所讲过美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课我基本上都会去听，收获很大。当时我们研究生院虽然条件不是怎么好，八个学生一个宿舍，分为上下铺，教室也多为牛毛毡搭的临时建筑，但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经常在借用的北师大教室晚自习结束之后，到这种牛毛毡房挑灯夜读。我们那一届研究生当时称为所谓的“黄埔一期”，即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而那时还没有博士生。可以说，三年硕士研究生为我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培养了我认真读书的习惯和广泛研究的兴趣。

宗教学的敏感性及其与科学的关系

黄：好的，我想再追问一下，就是在这个阶段，我记得好像有一句话，在上世纪的80年代比较风行：“学好数理化，走满天下都不怕”。大家因此对自然科学非常重视，而中国因为受“五四运动”以来突出科学的影响，总是觉得科学与宗教是矛盾的吧？那么，您作为宗教学的研究生，在这样一种学术氛围中专门做宗教学研究或者基督教研究，是否感到有压力或困难？在那个时候，与其他的学者比较，或者说在这种社会大氛围中，您能找到知音吗？是否感到有很多观念方面的差异？

卓：是有压力，从报考宗教学研究生开始，我就切身感受到宗教问题的敏感和研究宗教不为社会所理解。如前面提到的，我所在大学的校长知道我报考后就批评了我的这个选择。我的高中班主任也百思不解我为什么要研究宗教。不少研究宗教的学者都感到投入这种研究就好像带有“原罪”一般受到别人的误解和责问，我也深深感受到，研究宗教恰如“扑尔敏”那样，扑向这个学科就势必“过敏”！我曾经呼吁，中国社会应该使宗教“脱敏”，然而，不但宗教没有脱敏，我们研究宗教的学者却成了“敏感”人物！

这种处境非常令人遗憾，而这种对宗教的认知及态度，也很难使中国被世界所真正理解，且不利于中国社会自身的和谐、稳定。为了中国社会能够保持长治久安，为了共同建设好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必须对宗教有正确的认识，也理应包容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存在，更应该放弃对宗教研究者的偏见和歧视。

不过，我们上研究生赶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这是一个探讨和摸索的时代。特别是在讨论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上，我的兴趣非常浓厚。其实，对于自然科学我本来就是情有独钟的。高中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两门课，一个是物理，一个是数学，我还当过数学科代表，自学过大学物理。当时我上家乡的大学，初衷就是奔着物理学去的，有着强烈的物理学情结和痴迷的自然科学之梦。因为当时我在高中就在自学修理钟表、安装半导体收音机，我的母亲是在当地教学仪器站工作，就是为当地大学、中学的物理学、化学这些课程提供教学仪器的。我所在的这个师专也有物理学专科，而且这个物理学的教研室主任与我们家很熟，我在中师教师培训班学习时，中师的周校长知道我喜欢物理而专门为我借来当时湖南大学所用的物理学教材让我自学，后来也是这位校长推荐我去了当地的大专。所以，我当时很希望能通过那位师专物理学教研室主任的介绍而让我能够转到物理学专科去。遗憾的是当时明确规定，我们应届高中毕业生上了大学只能学外语、体育和音乐这三门专业，我转科的目的无法实现，这才放弃了对物理学的追求，从此，走向文科学习之路。虽然放弃了物理学科，但是，我一直关注自然科学史的研究，对当时最新科学的发展也比较感兴趣。对之我虽然不懂，但是关注。记得我们家乡新华书店曾经来过一本关于人造卫星的书籍，我硬是说服售书员把那唯一的书卖给了我。在大学图书馆，我看到一本关于人类自然科学历史发展的书籍，对科学发现进行了编年史那样的排列，我就把这一科学编年全部抄了下来。在自然科学历史的研究上，应该说读了不少书，所以，在我们研究所工作期间，也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有关科研人员有着非常亲切的接触，我还专门登门拜访过他们研究所的席泽宗院士，曾想邀请他参加由我组织的

宗教与科学对话的国际论坛。从欧洲历史发展来看,宗教与自然科学有非常复杂、充满辩证意义的交织,二者既有矛盾冲突,同时也有科学为宗教服务、宗教利用科学来论证其信仰的案例,因此,我们不能把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尤其当时中国流行的那种好像宗教跟科学只有必然对立的观点,我本人是持保留态度的。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关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史是我的业余爱好,当时做的笔记从远古的自然科学发展一直到 20 世纪最新成果,记了厚厚的一本。只是后来我上研究生到了北京,简单地想跟过去告别、忘掉那个幼稚的我而开始一个全新的自我,故而把自己以前所写的日记、所记的笔记全都撕破扔掉了。现在看来是个错误,因为年老而想“追忆似水年华”,很多东西却再也找不着了,而那时做得非常细,本该保留的,真是追悔莫及。

所以,我一直保留了关注自然科学发展史的习惯。在组织宗教与科学对话的国际论坛时,我曾经利用假日专程拜访了好几位院士,为此甚至还放弃了去台湾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本来这些科学家不愿参与任何关涉宗教的讨论,在我的诚意感动下最后来了三位院士,我记得天文学家王绶琯院士在参加我们那次论坛后,又参加了其他院校组织的宗教与科学对话会议。此外,在中科院组织编辑科技百科全书的时候,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这一部分就是请我负责组稿和编辑的,我因而专门邀请研究所的同事们参加编写了自然科学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关系等,而自然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则由我自己撰写。这样,我对宗教跟科学的关系问题并不陌生,而且一直是持有比较辩证的看法。当前社会上关于宗教与科学的讨论,如天文学、量子科学、生物学、环境科学、人工智能等方面的话题,我都十分关注,而且也做了一些功课研究,特别是最早在国内写文章讨论上世纪下半叶关于“新时代运动”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对《物理学之道》等著作也有过相关评论。在科学史与宗教的关系上,我曾经关注过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科学家与天主教的冲突、以及他们个人的命运问题。其实,这些冲突不只是与宗教相关,也与不同时代的科学观相联系,因为欧洲中世纪的天主教拘泥于古代托勒密的天文体系,用的是这种旧的自然科学观念体系,对新的自然科学发展萌芽不敢或不愿确证及承认,教会要维系社会的稳定、护持传统的权威,对于对它表示反对、否定的观点势必会出面反对,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历史上对一些科学家的伤害,以及对科学发展的阻拦,故而会反对哥白尼等人在当时带来的新发展和提出的新观点。而现在,天主教已经完全接受了新的宇宙观,并且向伽利略等科学家表示了道歉、为其正名。罗马教廷还专门成立了教宗科学院,其院士有不少都是诺贝尔奖得主。在中世纪,当时的一些科学家本身就是天主教僧侣,他们的很多自然科学实验、研究也是在天主教修道院或教会机构里面做出来的,所以要教会乃完全反科学的话,是绝不可能允许这些自然科学家进行研究的。应该承认,宗教在历史上是不断地调适与科学的关系,对待科学既有张力也有包容和接受。对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必须一分为二地分析,实事求是,既要看到它曾经因为种种原因确实对科学家有所打压,对一些科学成果拒不承认,但也要看到宗教也在关注科学的发展,在不断调整自己对科学的认知。我个人认为,这种看法会比较辩证、客观一些,体现出历史之公平。

黄:对您刚才讲的这种作为一个宗教学者或者基督教研究的学者,在上世纪 1980 年代您公开发表过这种学术观点吗?对于当时的主流学术思潮,您觉得能够接受这类观点吗?或者,当时这种看法有可能完全发出来吗?

卓:当时我们还没有发表这些见解的资格,因为我们是学生,主要是学习这些内容。那时的学风比较朴实,学校和导师并不鼓励学生积极发表文章,更没有像现在这样有硬性任务。学生的职责就是好好学习,尽量多读书,积累专业知识,训练研究方法。

高等院校的宗教学研究及招生情况

黄:但是,那个时候中国大陆也开始号召走向世界嘛,让国人积极走向未来,这个是改革开放大的趋势和主流。另外,当时也是宗教政策得以恢复、落实的年代,而基督教和其他各个宗教的活动也慢慢地正常化起来了。但尽管是这样,真正招收宗教学研究的研究生仍不很多,当时除了社科院之外,

好像其他高校招得并不多吧？

卓：专门从事宗教学研究的研究生，应该说当时主要是我们社科院在招收，但北师大有一批代培的研究生也挂在我们所里，不过以学习中国哲学为主。当然，那时北京大学也招了一批研究印度佛教、亚洲宗教等方面的研究生。

黄：对的，但后来在高校里面也新建了一批宗教学系或宗教学专业，这个是1990年代的事情吧？那么，围绕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讲，您读硕士时您的硕士论文是写哪一方面的题目？

卓：高校以四川大学为首，早在1980年就成立了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并开始招收学生。后来，北京大学等高校也成立了宗教学系或专业，如北大宗教学系最早就是和我们所联合开办的。

硕士论文研究现实主义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年6月21日—1971年6月1日)

卓：我的硕士论文是写美国当代基督教思想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当时，导师让我们四个学基督教专业研究方向的学生分一下工，我那天碰巧不在学校。听说本来是要把基督教思想理论研究这一专业方向分给比我大十岁、就是我们中间英语最好的那位来自复旦大学的同学，但他说自己年龄大了，还说他就想研究基督教的现状。这样，基督教思想研究专业就让我来学了，我从此就定下来研究基督教思想史，其他人的分工则是有一人研究中国基督教的历史，还有一人专门研究天主教。

当时我主要是侧重于现当代基督教思想发展的研究，而我对尼布尔感兴趣是因为他是现实主义神学家。因为我们都经历过文革，我在农村里呆了很多年，不再会充满理想，所以，我认为，自己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那研究尼布尔这样一位称得上是基督教现实主义者重要代表的人物，可能会更有感觉一些。尼布尔是新正统派的神学家，对现实非常冷静，既不会洋洋得意，也不会垂头丧气。他曾说，人生恰如攀爬桅杆的水手，上面是旗杆所在的巅峰顶点，下面却是波涛滚滚、可能给人带来灭顶之灾的万丈深渊，而人就恰恰处在这二者之间。所以，他对社会政治的分析非常理性和睿智。例如，我们今天讲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所谓“尼克松主义”，其兴起实际上就是受到美国基督教新教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尼布尔等人的现实主义分析的影响。尼布尔在当时被称为“美国国务院御用神学家”，他当时就力主美国政府联合中国来共同对付苏联，他提出的这样一个战略构想被基辛格所接受，并启发他为此而给尼克松出主意。于是，尼克松派他悄悄地经巴基斯坦而到中国来访问，商量中美关系的巨大变化。当时人们在这种氛围之下只看到基辛格的努力和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却不知在他这个后面有着基督教现实主义思潮的社会大背景。尼布尔在他的很多著作和文章里面都谈到联华反苏的这个问题，而我在写尼布尔的硕士论文时阅读了大量尼布尔的著作，注意到其中许多地方都论及这一方面的问题，我后来在研究尼布尔的著作中也专门谈到这一点。所以说，尼布尔不仅是做抽象的神学理论研究，而且也关注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由此提出他的对策建议。于此，我就觉得这个人在中国确实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我对理想主义的浪漫思想是敬而远之，而对现实主义的研究则情有独钟，觉得这类研究带来的思考、启发可能对我们来说会更直接一些，会更有现实价值。所以，这是我选择研究尼布尔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一个直接动因则是我的导师在文革期间已经翻译了一部分尼布尔的著作，而且已经在当时研究美国哲学的相关译丛中翻译出版了。这样，也已经有一些现成的中文资料给我们提供启迪和参考吧。

黄：噢，所以您就来研究这个问题了，那么您的这个导师赵复三先生是有留学背景吗？还是有着国际生活的背景呢？

卓：赵复三先生原来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精通英文，据说他年轻时用英语讲解《圣经》曾风靡一时。赵先生的家庭背景与国民党政治有较深的渊源，他的舅舅担任过国民党的高官，但他在上世纪1940年代后期悄悄地参加了革命，而他的家庭也跟中国教会有着密切的关联。

黄：您刚才提到的同学，即和您这一批共同来做基督教研究的同学，在您们四个人是不是有一个即林金水？

卓: 林金水是我们这一届的同学。他是我们在北京参加基督教专业硕士研究生复试时的八个人之一, 我们是好邻居、好朋友。但我们的导师赵复三先生是学习外语出身的, 所以, 他最初招收的四个学生也都是学习外语专业的。他要求学生的外语应该比较好。这样, 他就推荐林金水到了历史所学习历史专业, 请马雍先生即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专家来带林金水, 所以, 林金水硕士期间主攻意大利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研究, 是中国当代系统研究利玛窦的第一人。我们这四位中则是孙善玲女士研究中国基督教历史的, 她以新教传教士李提摩太作为研究题目。她此后还参与了《基督教史》的翻译。

黄: 她就是段琦老师的学生吗? 好像是一起翻译的这本书?

卓: 她不是段老师的学生, 而是我们的师姐, 她和她的丈夫与段琦老师三个人共同翻译了那本书。我的两位师兄一个是任延黎, 专门研究天主教的, 另外一位是陈向荣, 他是研究基督教的现状, 硕士论文写了美国基督教的大觉醒运动, 他的英语很好, 后来就改行到研究生院教英语去了。这是我们四个人的情况。

黄: 那后来您毕业之后就留在社科院了?

卓: 毕业之后, 我们专业的同学当时留下了三个人, 后来有两位调走了, 而任延黎先生则是在从意大利留学回来以后重新到我们所工作的, 并且一直工作到退休。

留学德国攻读博士(1983-1988)

黄: 那么, 您是工作几年后又出国留学的?

卓: 我是 1981 年毕业留所工作, 1983 年出国留学。

黄: 听说您这个留学还有一段神奇的经历, 因为您原来没学过德语, 却去了德国留学。

卓: 对呀, 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不可思议。我出国留学应该是在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就确定了, 毕业前曾准备让我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 但当时因为没有毕业不让出去而作罢。毕业后我们准备到美国去留学, 所以, 当时我们 80 多人参加了社科院的一个英语培训班, 请了一位美国教师来教我们托福课程。那时候, 我在托福班上英文还是比较好的, 在班上的托福考试曾考得前一名, 后来, 在社科院送我们到教育部参加出国考试的学者中间, 我和另外一个学经济的同学考了个并列第一名。最早我自己曾联系到美国德鲁大学, 对方也发了邀请函。但我的导师说还是去芝加哥大学吧, 芝加哥大学的宗教学专业比较好一点, 是美国宗教学两大学派之一, 另一派即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著名宗教学者伊利亚德的弟子北川三夫教授与我们所好像也有一些联系。

但正在留学准备的过程之中,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有个代表团访华, 其成员有天主教人士在与我所座谈时主动跟我们研究所提出来, 愿意联合培养一个博士研究生, 即资助其到德国去留学。结果, 我的导师就动员我不去美国而去德国学习, 并且说, 德国是哲学的故乡, 基督教思想的底蕴也比较深厚, 而且, 他劝我乘还年轻再多学一门外语吧, 德语对于研究哲学和神学尤其必要。这样决定下来以后, 德方很快就帮我联系好了慕尼黑大学, 不久慕尼黑大学也发了入学通知和留德邀请函。本来, 一般情况下中国学者到德国学习, 通常先要到同济大学培训一年再能出去。当时同济大学也给我发了这个培训通知, 培训工作由教育部负责。那时我已经拿到了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入学通知书, 也不是太懂德国的情况, 我觉得如果拿到入学通知书而不去及时报名注册的话, 那么, 留学的机会可能就会作废。所以, 我自作主张说, 既然通知书都已经来了, 那我还是赶快去德国吧。同济大学属于教育部管, 而中国社科院与教育部不是一个系统, 对我们的要求也没有那么严, 如果你愿意来学习德语当然更好, 但不来也没有关系。于是, 教育部就直接让我办手续去德国留学了。

“为学犹如金字塔, 既要博大又要高”的思路成就了德语考试的奇迹

我办出国留学之前没有学过德语, 只是私下找了一个原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播音的老师, 教了我一点 ABCD 入门、简单而皮毛性的德语, 然后, 就飞到德国留学去了。1983 年 5 月底, 我到了德国,

随后收到的大学正式通知书告知，我要在9月中旬参加大学德语入学考试，考试通过方能入学就读。你看6、7、8月到9月中旬，一共就只有三个半月的时间，而且，还要办移民局、健康保险等手续，一下子给我的压力就很大，当时真的就蒙了。这个考试通知书是我到了德国才拿到的，我事先并不知道，德国大学入学的条件是要先通过德语的入学考试，早知道可能我就打退堂鼓不来德国了。我在中国拿到的入学通知书并没有考试一说，到了德国我就慌了，问当地住在学生宿舍的中国学者说，这个该怎么办啊？这些早来的中国留学生看见我比较着急，就向中国驻德大使馆负责教育的同志汇报了，但使馆的同志说得很轻巧，回答说：那还不简单，考不上就回国呗！这样就更加增加我的压力，但我不甘心，也想那就拼一下试试吧。提供奖学金的机构安排我在隶属于慕尼黑大学的一个德语培训学校就读，因为歌德语言学院的学费太贵，所以，没有安排我去。大学培训学校与歌德语言学院的要求差不多，一般就是让你学习一年以后再参加这个大学的入学德语考试，其课程安排是在初级班学习四个月，在初级一班学习两个月以后有个考试，然后进入初级二班再继续学习两个月，随之进入中级一班学习四个月，遂可进入中级二班学习四个月完成整个德语培训学习，所以，到中级二班学完的话正好是一年的时间，只有进入中级二班以后才有资格参加考试。按照常情，我是根本不可能赶上9月中旬的考试了。但我想，我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不可能按部就班去学，所以，必须争取时间。于是，我就拼命学，本来我入学的时候就已经比较晚了，还剩一个多月就是初级班的考试，但我就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考试。结果这一考试竟然考过了，而且，我好像还在那些参加考试的学生中考了个前五名，所以，我就敢跟老师申请，让我直接升入了中级一班学习。这样，我等于节省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到中级一班学了两个月之后，本来还要再学习两个月才能进中级二班，但离考试已经没有几天了，我不得不跟老师提出来，希望让我跳级到中级二班，这样才有资格参加大学德语考试，那位好心的老师居然也就同意了，所以，我到中级二班后也就学了十天左右就直接赶上大学考试了。现在回想起来那种连滚带爬地学习跳级还真是有点悬，也让我高度紧张，丝毫不敢放松。

慕尼黑大学入学资格德语考试分两种情况，如果考生考得非常好，那么笔试考完就直接通过；如果笔试不好就直接淘汰；而如果笔试考得还可以，但不是那么特别的好，则还要参加口试，只有口试通过才行。我是匆忙参加考试，其状况就属于得参加口试的那类。参加口试时，我看到我们中国学生中有一些是在国内大学学过四年德语专业的，而且已在德国语言进修了一年，一共有五年的德语底子，因此我也就感到踏实了。那个口试我也顺利考过了，这样就获得了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的资格。

根据考试的体会，我之所以能够顺利考过，就是在于德国的语言考试和我们国内的考试不一样，考题不是注重考语法，而是考各种人文知识，这就要求考生阅读量大，而且阅读速度要快。但我一有英文的基础，有些词汇是相同的，二是我的人文知识比较扎实，结果这种考试反而成就了我。如果光靠语言语法范围的考试那我可能就没戏了，德国的语言考试则重在实用，没有一定的知识量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考生若缺乏相关知识连题都看不懂，那就没法回答了。所以，掌握相关的文史知识对于学习语言很有必要，我通过这次考试的检验也算是尝到了甜头，其实这是我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一位资深老师支的招，告诉我学习文科需要知识渊博，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奇峰突起，在某一点达到突破就有成就，而社会科学则要求“为学犹如金字塔，既要博大又要高”。知识面广会帮助你了解相关语言的背景情况，使你一下子就能明白语意，很快进入角色。

黄：所以说，这种学习方法其实您原来在湖南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打了基础。

卓：对呀，就是说博学会在这方面的益处。记得我在德国学习两年以后，有一次去参加他们德国友人为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文化访问，等于是文化旅游吧，期间会参观一些名胜古迹、历史重镇和教堂、博物馆等，那就需要翻译嘛。一开始德国朋友请了北京大学德语系的教师来翻译，这位教师德文非常好，发音纯正、语法标准，但其文史知识面却不够，第一次就到考古博物馆听讲解，生疏的内容使之一下子就懵了，根本听不懂。这时他们就让我出来试试做翻译，没想到我竟然如鱼得水、翻得很好，甚至

好像就是我在那里做讲解一般,可以说那一次是让我出尽了风头。人家都好奇地问我来德国多久了,我说只有两年,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参加那次旅游的中国学生不少在中学就开始学习德语了,而后又在大学学了四年德语专业才来德国留学的,但连他们都感到怯场不敢出来翻译,故对我的感觉是很奇怪。

其实,就在我参加大学入学德语考试完了之后,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一位在德国已经两年多的中国留学生找我取经,说他都已经来德国两年多了但考德语还是通不过,而我三个半月一次就考过了,问我有什么经验可以告诉他。于是我就跟他开玩笑说,那你就找个德国女朋友帮你练习德语吧,他听了哈哈大笑,说他的老婆就是德国人,在云南学习时认识的,结婚后随夫人来了德国。我说那你不行,你都拥有了德国人的家庭了,这个德语考试还考不过,那可能就没有学习语言的天赋了。我在学习德语时想找个德国人练练口语都不行,跟德国人搭话他们觉得你怪怪的,基本上不会搭理。有一次在我们宿舍附近的英国公园散步时终于找到一位 40 多岁的老外愿意和我说话了,但交谈几句后才知道原来他是捷克来的移民,也是想找人练习德语口语。我们真是两个可怜的老外啊!但话又说回来,入学德语考过并不意味着语言就过关了,其实我当时所掌握的这种语言知识结构对于学习专业还远远不够。所以,我进了大学以后的第一个学期基本上就是拼命听课,在这半年我没有修一个学分,而是恶补这个专业学习的德语能力,什么大课、研讨班都去听,其他时间就是拼命地自学,以此弥补语言及知识上的缺陷。

慕尼黑大学的神学及哲学和汉学学习

黄:那您就是 1983 年 9 月份入了慕尼黑大学?

卓:对,是 9 月份考试通过,到了 11 月份才正式注册入校。

黄:哎呦,卓老师,我和您是同一年入学,我是进入本科,那一年我是 7 月份高中毕业,然后 9 月份上了大学本科,但您是去读博士了。对了,那您可不可以简单地介绍慕尼黑大学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大学的神学研究主要做什么、它的基本状况是个什么样的?应该说慕尼黑大学按照传统来看在办学上起作用的还是以天主教为主吧?

卓:慕尼黑大学有天主教神学系和基督教新教神学系,分为两个学系,但是我的主科专业是在哲学系。哲学系有个著名的讲座称为瓜蒂尼讲座(Guardini Lecture),这最早是为一个祖籍意大利的神学思想家瓜蒂尼(Romano Guardini, 1885-1968)教授设立的,以前是设在柏林大学,二战结束以后转到慕尼黑大学来了,讲座全称是“基督宗教世界观与宗教哲学”讲座,其第一任讲座教授就是瓜蒂尼,第二任教授是著名天主教神学家卡尔·拉纳(Karl Rahner, 1904-1984),第三任教授就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毕塞尔(Eugen Biser, 1918-2014),他在欧洲很有名,但世界范围好像不是太有名。这个讲座是慕尼黑大学哲学系的五大讲座之一。除了哲学主科之外,我还在基督教新教神学系学了一个副科,在东亚系以海外汉学为第二个副科,因为按照慕尼黑大学的知识结构要求,每位学习文科的学生都要学一门主科、两门副科。

黄:所以,您主科是哲学,那然后又学了一个副科,是天主教神学还是基督教神学?

卓:是基督教神学即新教神学,因为我的主科导师是天主教背景,他的课与天主教神学有关,有些课程还是与天主教神学系联合组织的,所以,我在基督教新教神学系学了一个副科,这样两大神学领域也都可以研究。此外,当时大学的宗教学专业是设在新教神学系的,后来才转到哲学系。这样,我共有三个导师,哲学、神学、汉学都包括在内了。神学系的导师是毕克勒(Horst Bürkle),汉学导师是施密特-格林策尔(Helwig Schmidt-Glitzner),他的中文名字是施寒微。中国人了解自己的文化是如何在海外传播的也很有意义,所以,就选择了东亚研究专业。施寒微教授经常到中国来,当时他是慕尼黑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

黄:是东亚学吗?

卓：东亚学就包括汉学，还有日本学、蒙古学、朝鲜学等。他是研究宋史的，对中国宗教、文学等也很感兴趣。30多岁当上教授这在德国都算比较年轻的，他后来去德国北部哥廷根大学附近担任沃芬比特尔(Wolfenbüttel)图书馆馆长了。所以，这就是当时慕尼黑大学文科的学科结构，其分学科学习的进路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当时，我们按照大学课程，既去听全校性的大课讲座报告，也去听各个系与我们相关的专业课程，还参加我们自己研究所的专业课，并有具有辅导、补习性质的课程小组活动。此外，德国的图书馆也是多样的，在慕尼黑有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是德国第二大图书馆，有大学图书馆和各个系的图书馆，还有各研究所的专业图书馆。这样，我们的学习资料比较丰富，去图书馆的选择空间也很大。根据学校读博士学位的要求，我先后修完了硕士博士的学分。

黄：您把硕士学分也修了？

卓：对。

黄：因为涉及到神学是吧？

卓：不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办的研究生院在慕尼黑大学没有记载，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大学，所以，我的学历在当时认证上出了问题，慕尼黑大学把我的学历认证拿到当时作为德国首都的波恩找德国教育部认证，德国教育部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多一点，知道我们社科院办了那个研究生院，所以，给慕尼黑大学回复，部分承认我的硕士学历，即硕士论文可以不写，但是读硕士的学分要补齐，就是有这么个妥协的结果。

黄：讲这个学历，我的经历可能很相似，在芬兰也是，他不是光看您学位的，看您课程表学过哪些课。

卓：对对对，所以，对于我而言，那么，主科副科的学分就都得修了，你想，在那两年多的时间内要把学分全修完，对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很不容易。读硕士的学分，先要修初级研讨班学分，修两分后，才能修高级研讨班学分；通常修一分要上一个学期的初级研讨班课，要写一份15页的(德文)学习报告，然后，要做一次半个小时的报告，根据报告在研讨班的评议来修改，最后才能把这个(德文)报告交给老师给你打分。我的初级研讨班学分一共修了两个，后来系里就给我免了初级班学分，修高级研讨班学分也是要修一个学期的课，写一份30页的(德文)学习报告，在研讨班做一次45分钟的报告，然后，修改好报告交给老师打分。这种高级研讨班学分读硕士学位需要四个，而读博士学位则需要八个，我一共修了九个。

黄：所以，获得的知识会特别多，让人有学得如饥似渴那种感觉。

卓：当时改革开放初期，有报告文学说，陈景润为了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而写了一麻袋的演算草稿。其实，我读学分的每一个报告都是三易其稿才交给老师，后来，我看到自己宿舍放所写报告的初稿、废纸也堆得差不多是一麻袋了！所以，这样写完前后十余份报告以后，对自己学术写作能力的培养提高也很起作用，完成学分之后我的博士论文半年就写出来了！

博士论文

黄：您博士论文是什么？

卓：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当代中西宗教理论比较研究》(China und ihre Bezugnahme zu Religionstheorie des Westens, 1988)。毕业后我已经正式出版了德语版的论文，是国际上一个很有名的学术出版社叫彼得·朗出版社(Peter Lang Verlag)，在德国、法国、瑞士、美国都有分社。你大概知道专门出版学术著作的欧洲出版社，对这个出版社有所耳闻。

黄：是的，我知道这个出版社，我有些同学的论文就在这里出版。所以，有了非常好的训练，就写起来非常得心应手，那您是哪一年毕业的？

卓：我实际上在1987年就读完了，我1983年去德国，应该说1983年11月才入校，大约四年的时间读完，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般外国学生在德国留学要十年，我有来自亚洲的同学，比我早两年

来德国,我读完博士回国两年后再访慕尼黑时看见他还没念完。慕尼黑大学对上交博士论文有规定,博士论文做完了如果没有正式出版的话,就要作者自己印刷 120 本交给各个大学的图书馆;如果是正式出版的论文,那么交给大学五本书就行了。所以,我为了正式出版自己这第一部书,在德国又多待了一年才于 1988 年回国,这样我前后在德国一共度过了五年半的时间。

总结德国留学的经验所得

黄:五年多,那么,您是 1988 年几月份回国的?

卓:我是 1988 年底,11 月份回国的,从 1983 年 5 月底算起来将近五年半的时间。

黄:您在德国读博士,是您们社科院给您的一个交流项目吗?还是其它项目?

卓:是德方跟我们所的一个合作项目,所以,我拿的是德国奖学金,没花国家的钱。我到德国就是安心学习,没去打工挣钱,但我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想法,因此,放假的时候就去欧洲各国了解当地的名胜古迹,到过不少地方,我也有喜欢到处跑这样一个特点。

黄:如果简单地总结一下,您在德国这五年多的时间,总体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卓:这对于我的学术发展是一个质的提高,特别是视野由此而开阔,这对于宗教研究帮助巨大,看问题就更为透彻了。

黄:不仅仅是理论上吧?也包括看到很多实际情况,是从理论到实践都有收获。

卓:对的。另外,就是自己在学科的研究方法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德国人做学术非常严谨,在方法上就是强调逻辑严密,要体现出一种思辨精神,再就是强调研究学问首先要有查找资料的功夫。而看问题则要有一些独特的观点,不能人云亦云、平淡无奇。

黄:那么,必须得要有自己的突出性特点,要有超越前人的地方。

卓:这种训练对我来讲,应该说是学术视野、研究方法上的脱胎换骨,有很大的提高。在这五年多时间内,德国不像中国大学要求博士研究生必须发表什么两篇核心论文,在那五年多时间内我连一篇发表的文章都没写,除了修学分以外就是踏踏实实地读书做研究,扩充自己的知识,这样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黄:然后您就出版了博士论文这本书。

卓:是的,博士论文是我的第一本书。

黄:我们也是,我们一般讲,这个博士论文是一个学生成为一个学者的奠基之作呀,好像这是进入学术圈的一个起点。

卓:而且,德国口试答辩也很有意思。学生博士论文写完上交以后,学校考试委员会就将之交给两个老师来评分,评分通过以后再组织的口试就不叫什么博士论文答辩了,干脆就叫博士答辩,主考老师一般不问你论文里面的问题,而是综合性地问方方面面的问题,考的是学生的知识面,而我们现在国内博士论文答辩就基本围绕着论文来展开。德国博士考试的综合分数包括两个老师对论文的打分,博士论文通过再安排口试,分主科和副科三场口试,博士毕业的总分数是根据两个老师打的博士论文分加上三个口试分,这样综合起来的分数就是总分数的等级,如果通过就分为全优、优良、良好、及格四等。

黄:这样说我要感谢您了,您是我的第二个博士答辩的老师。这个中文的博士答辩在德文中怎么说,主考人称答辩老师还是其他?

卓:称考官或者是主考老师,德文中博士考试答辩的专门词就是 Rigorosum。

黄:对,芬兰语叫做 opponentti。

卓:所以说,留德对我的知识面、视野开拓等帮助就是很大。我回国以后的前五年还看了一些书,因为当时没有担任行政职务,但后来从我担任副所长到现在已经将近 25 年,这期间已经没有时间认真系统地阅读、广泛地涉猎,而只能是为了某一个研究课题去看相关的专业书,我感觉自己系统读书

就是在德国的五年和回国后的前五年，这十年看书真是获益匪浅。到德国留学对我来说一是多学了一门外语，二是学到德国人做学问的那种严谨，三是受到德国人系统性研究的熏染，所以，我现在考虑问题相对而言会比较系统，这跟当时在德国的学术训练是有关联的。

二、您回国之后的研究成果

黄：那好，那我们现在就谈下个阶段，即您 1988 年回国之后的情况吧。您还是回到了世界宗教研究所，您说一开始的五年还能读些书，是 1988 年到 1993 年吧。

卓：是的，1992 年我被破格评上研究员，1993 年就开始参与行政工作了。

副研究员和正研究员生涯

黄：1988 年您回来那时候就是副研究员了？

卓：没有，我回来以后才评的副研究员，大概回来一年以后评的副研究员，到 1992 年参加院里高级职称破格考试，这样评上了研究员。

黄：那还是比较年轻啊。您是哪年出生的？

卓：1955 年的，当时在 37 岁评上研究员，38 岁开始当副所长。

黄：那您回来之后，最初五年主要做了什么研究课题？

卓：这个五年我基本上是专心做研究，因为我回国前我们研究所的领导说，外文再好不是决定性的，拿到博士学位也不是决定性的，而真正看学术水平就是看能否写出像样的东西来，能有什么学术出版。这个话实际上对我刺激很大，我在 1987 年博士口试通过后曾回国休假，听到所里领导的这些话之后，就改变了我当时已经开始学习古典语言的计划，转而去写学术著作了。现在回想起来，应该说，我真是觉得，自己在这个选择上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本来我已开始古典语言的系统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这三个课程我都已经报名参加，并已开始了一段初级学习，后来，我反复琢磨我们领导的话，感到如果回国以后没有学术成果，恐怕别人会瞧不起，以前就有同学说，我们这些年轻一些的研究生就是会考试，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写不出东西来。而如果回国后要想堵别人的嘴，领导已经明确指出光靠博士学位、会外语还不成，必须要有真的学术成果。在琢磨回国的准备上，这种功利性想法逐渐占了上风，所以，那一年我回到德国就开始为写书收集资料，并且干脆放弃了古典语言的学习，现在的确后悔莫及，但已无法弥补了。随着思路的改变，我用中文所写的最初三本书的草稿就是当时在德国完成的，回国以后就马上联系出版社准备那三本书的出版，其中《宗教与文化》一书在德国时就直接写信联系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薛德震先生，没想到他真的给我这个无名之辈回函让我把书稿寄到出版社看看质量如何，这就促成了我在国内第一本书的出版。所以，我回国后仅用了一两年就出了三本书，加上德文博士论文专著，已有四部著作出版了，《宗教与文化》1988 年 10 月出版，《宗教起源纵横谈》1988 年 12 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另一部《西方宗教学研究导引》则于 1990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当然，这些书都不是太厚，属于篇幅比较小的书。

黄：但那个时代年轻人出书非常重要啊！

卓：当时，我的中外文著作等于是有了四本书在那儿，这样的话，评副研究员就比较轻松了，年轻学者那时能出这么多成果的人不是很多。

黄：那您这一回来也就得到重用了吗？

卓：评副研究员以后那几年比较边缘化，所以是我潜心学习提高的几年，在学术上受益匪浅。期间，我也尝试过参评研究员但失败了，有评委那时说他们看不懂我的德文著作，所以无法评价我的学术水平。

黄:那在出版了这三本书之后,即您后来几年主要是研究什么?

卓:后来我就把重点摆在基督教研究去了,所以,在基督教研究方面写了一些书。

黄:您写《当代新教神学》和《当代天主教神学》,那个时候要更早吗?

卓:出版那两本书时我已经评上正研究员了。我评上正研以后又写了这两本书,那么比这更早出版的有《圣经鉴赏》《基督宗教论》等。

黄:那好像还有什么圣经词典或什么的词典,您编过一个什么词典吧?

卓:我们研究室编过基督教词典,但我没有参加,因为要写“中华文化通志”项目中的《基督教犹太教志》。我申请评正研之前,又写了几本书,当时破格评正研一是要有学术著作,另外则是要考两门外语,其实我申请破格参评正研时已经有了四年副研的资历,如果是有五年副研资格就不算破格了,正好我副研四年的时候参加了破格考试。

黄:但像您这样两门外语都这么好的,还是不多吧?

卓:是不多,我是 1992 年通过院里破格考试两门外语而评上的。当时全院破格评选了 4 名正研、1 名副研。得以破格评上正研的有樊纲、现任我院副院长的李培林、经济所原来的副所长朱玲、以及我本人。全院当时参加破格考试的也大概得有四、五十来人吧。

黄:那我是不好意思,当时在北京不认识您们。可以说,我和您是擦肩而过,我是 1991 年到芬兰去的,您是 1988 年回来的,我是 1987 年来北京学习的,我原来并不搞现在这一行,而是学习语言学的。您评了副研之后,就做了几年基督教研究室的副主任吧,然后 1992 年评的正研,那么 1993 年以后呢?

任期最长地担任了 25 年的副所长和所长

卓:1993 年之后就开始当副所长,主管研究所的外事,于是我就开始组织国际学术会议了,最初于 1994 年与爱德基金会合作在北京组织召开“基督教文化与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

黄:当时的所长是谁?

卓:当时我们研究所的所长是吴云贵先生,是研究伊斯兰教问题的。我们两个人是同时被提拔的,他是从伊斯兰教研究室的副主任直接提拔而当上所长,我是从基督教研究室的副主任提到副所长岗位上,然后又兼任基督教研究室的主任。

黄:您做所长时间是比较久的。

卓:加上副所长任职,到现在是 25 个年头吧,足足任职 24 年的时间。

黄:这么久啊,那您算不算您们研究所任所长时间最长的? 您们研究所创始人任继愈先生担任了多久的所长?

卓:任继愈先生自 1964 年担任所长,期间包括文化大革命十年,他担任所长一共是 21 年,至 1985 年他调到北京图书馆担任馆长。我当所长的年头没有超过任先生,只有 20 个年头,但是我在研究所担任行政领导的时间、即加上副所长任职时间则比他还多四年。任先生 1985 年调到北京图书馆去当馆长,离开了我们研究所,而我则是一直在这里没有离开过,迄今不当所长了,也一直没动。

黄:您做所长是哪一年?

卓:是担任副所长五年以后的 1998 年,所以,到 2018 年恰好是 20 年。

黄:您做副所长的时候吴云贵先生是所长吧?

卓:对,他当了一届,然后我就接任了。

黄:那这以后您就比较忙了,但是,我看您还是在坚持学术研究。

卓:的确比较忙,但我还在抽空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科研人员不搞学问,哪成呢! 学问是属于自己的,是学者得以安身立命的看家本领,是自己真正的本行,其他则是身外之物、有无不定的。学问你必须得做,是不是这个道理?

黄：对，从现在我们追溯这段历史来看，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这种学术领导组织工作、即参与搭建相关学术平台也非常重要，学问可能是您一个人的事情，而学术发展则不仅仅是您个人，对其他学者来说也很重要，需要相关学术团队和学术活动平台，因而对整个学科体系的发展、对中国学术的推动等都非常重要。您觉得，您自己在推动中国宗教研究这个方面做了什么有意义的工作呢？这要从您 1993 年开始当副所长、以及后来一直当所长来评估。在这二十多年里，您觉得您自己在学术上主要有哪些感受，或者说您是如何开展宗教学、以及基督教研究的？

学术研究三部曲

卓：应该说，我回国后的宗教研究可以分为三部曲。

第一步是比较系统地介绍、研究西方宗教学的历史与现状。为此我回国后完成了那三本书的出版，在介绍西方宗教学的同时亦对中国宗教学的发展有所比较和思考，特别是对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有一些体悟吧。

第二步则是集中研究基督教，随着在学术上已经站稳，我就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我自己的专业本行即基督教研究。我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来做，第一个就是研究基督教的历史，但我还没有从古到今基督教史研究的系统著作，主要是从一些专题论文、从一些有关基督教文化史研究的文集里面对之加以探讨，其中包括把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做了一个学术梳理。

黄：您讲的这个历史，是指基督教会历史，还是基督教思想史？

卓：这个阶段主要是研究基督教会的历史，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重点研究基督教思想，主要侧重于研究当代基督教思想现状及其发展，其重点就是 20 世纪以来当代基督教思想的发展，为此我申请了一个社科基金重要项目，研究当代基督教思潮。其成果就是出版了一套丛书，由我主编，而且在其六本书中我自己就写了四本，内容涵括当代新教神学、当代天主教神学、当代亚非拉美神学、以及当代世界基督教会的发展概况。当代东正教神学部分我邀请了从俄罗斯留学回国的张百春博士来承担，他后来以这部著作而奠定了其研究东正教的学术地位，并且进而有更深入的拓展。还有一部著作涉及当代基督教的社会关怀问题，由我们研究所的一位同事来承担。这两位学者都因参加这一重点课题而在学术发展上有明显提高。此外，在研究当代基督教思想方面，我还专门研究了美国新教神学家尼布尔，并在台湾出版了一本专门研究尼布尔的专著。

第三点就是前面所言对中国基督教历史的专题研究。我们当时参加了由汤一介先生主持的中华文化通志项目，由我负责完成其中中国基督教犹太教志的撰写。

黄：那也会涉及到开封犹太教等问题吧？

卓：是的，但这里面一大部分主要是讲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

黄：讲中国基督教就是从景教开始吧？

卓：对，这样就粗线条地把中国基督教历史系统梳理了一遍。也探究了犹太教在中国的历史。

黄：这里所说基督教和犹太教只是指它们在中国的存在吧？

卓：是在中国的历史，这些课题的重点就是在研究中国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实际上基督教研究是我研究的重中之重，这方面出版的著作也比较多。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探究》等中国宗教与文化战略问题研究及相关的争议

黄：在您的三部曲中，最近主要是宗教理解和文化战略问题吗？

卓：是的。我后来当了所长，那就得思考一些宗教政策、宗教理论方面的问题，于是，我此后的研究就更多转到宗教理解与宗教文化战略这一领域去了。我最近几年写的书也多有这方面的侧重，感到宗教理解是中国目前需要关注和正确解决的。

这就是我回国后研究工作的第三步，集中到中国宗教与文化战略问题，亦涉及到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发展的关系。因为我处在这个工作位置上，必须思考这些有关宗教与当代中国，宗教与世界

现状的关系问题。应该说,我回国研究工作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并不是有太多的人关注,但第三个阶段的研究受到的关注比较多,而且受到的批评也比较大,就是说大家比较关心宗教政策和宗教理论问题,但这方面的分歧很大,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理解,甚至我根据阅读原著而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进行的研究也受到不少批评,让我也很是困惑。本来一些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但经过这种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批评后反而使人们的认识糊涂了。目前这个问题的探讨分歧仍然很大,不少观点截然对立,对这种理论混乱局面的发展我深感担忧。为此,我这几年专门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探究》等专著,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是抱着非常认真的态度,为此我一篇一篇地阅读了涉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宗教观的所有著作,而且阅读了中文的新旧译本、看了其英译本,也直接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著,这一研究花了我十多年的工夫,最近由中央编译局负责的经典作家基本观点研究的课题在北京大学结项,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其中研究丛书的 12 部著作中也有我完成的一部,其研究时间算起来前后也有 15 个年头了。

黄:对,我那次来,您给我看过那本书的试印版,装帧很漂亮。

卓:这就是我回国以后宗教领域研究的三个阶段吧,在第三个阶段专门研究基督教的成果就比较少,仅仅涉及过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而主要精力则放在宗教文化战略这一大的方面,侧重现实问题研究。

黄:这大概就是因为您做所长、以及后来担任中国宗教学会会长的缘故吧,这种担当使您必须考虑得更远更广,是不是?

卓:在中国这个氛围中,研究宗教现状就使人跟社会的交往比较多了,它涉及到方方面面,而社会对之也比较关注。所以,我就把研究的重心转到这个问题上来了,其实,做现实探讨也是我博士论文中实际涉及到的问题,这样就等于是回归到我撰写博士论文时候所思考的一些问题,而且,现在更有了一些实践经验。但非常遗憾的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人们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其理论认知到现在也没有得到理想的解决,好像还看不到质的突破之迹象。大家对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共识,也没有意识到其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这一问题确实很大,其如何解决势必影响到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走向。

黄:但是这个问题好像很复杂,好像基本上很难厘清。

卓:但我个人认为,我是已经讲清楚了其根本所在的问题了,不过批评方并不那么看,认为有原则性分歧。我个人认为,这些针对我的观点所展开的批评并没能真正反驳我的观点,这些批评一是没有全面透彻地来探讨相关问题,对我至少是有些误解或者是故意误解吧;二是我觉得相关批评既没有建构出新的理论框架,也没有通过他们的批评而把我这个理论的认知结构破坏掉,也就是说并没能解构掉我的认知体系。

黄:就是说,批评方在理论上,在逻辑论证上,以及在批评的客观公正性这三个方面来看,都没有掌握让人心悦诚服的真理。

卓:应该说,这在近十年的争论中,尽管各种批评比较多,但我一直还是坚持我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些观点是完全能够站住脚的,那些批评我的说法,既没能体现出真理,其强词夺理也仍然显得软弱无力。

黄:这一点我觉得很钦佩,作为学者,您这种独立性是需要坚持的。

卓:我认为是正确的,我就坚持,我可以跟你据理力争,但我总觉得,他们批评我的一些观点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缺乏理论支撑和学术规范。所以,我感觉,这些批评不是学术性的,但其政治考量却并不正确。我认为,在中国当前这种社会氛围和学术语境中,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的认知,必须提倡认真读经典,即一篇一篇地仔细阅读,一段一段地认真分析,一句一句地反复推敲。如果没有下这种基本功,没有充分的知识积淀,也就没有资格和能力来参加这种理论性和知

识性都很强的学术争论。

黄：但您的这本书出版后影响应该也很大，批评方就应该研究这些内容吧。

卓：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看这本书，没有看到就敢出来批评，那就是按自己的想象了，他们原来批评我不研究马克思主义，说明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的研究；而当我回应我有这方面的研究时，他们却断言那是“你的马克思主义”，不值得他们去研究。所以，批评者并没有具体说出我的这些研究著作错在哪里。其实，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看，至少可以说，他们没看懂，这种批评态度本身就不是科学的、学术的、公平客观的，其批评多有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之嫌。所以，这些年，我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使我处在风口浪尖上，有人形象比喻说是“在刀尖上跳舞”！我现在已回国 30 年了，我的宗教研究生涯也有 40 年了，大致就是这样三个阶段的研究，即研究国际宗教学的发展，展开对基督教的重点研究，以及思考探讨宗教与文化战略和我国宗教政策、宗教理论这三大块。这三个阶段对我的学术发展而言基本上就形成了一个发展的轨迹。

从您个人研究到为整个宗教学研究担任组织工作：国际及国内学术会议、丛书及刊物出版、宗教学会、学生培养等

黄：那按照这三个阶段、三个研究主题，我们可以再具体谈谈，来细化一下，增加更丰富的内容。比如说，您在学生培养，学术平台的搭建，学术会议的组织，以及学术刊物的编辑等等方面的工作。其中包括您们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这个刊物，另外，除了基督教研究这个系列丛书，有组织编辑出版了其他方面的什么书？我也是感到很荣幸，能有机会得到您的提携和帮助。您参加了我的博士答辩，您还给我的几本书出版帮助写了序言，然后我们还有学术合作，在您主编的“基督教文化丛书”中就曾出版过我的《汉语学术神学》等。我们还一起合作主编了“汉语学术神学丛书”。您的这些工作对于整个中国的基督教研究和宗教学研究出现学术繁荣和发展，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我们在学界的许多同仁们，对您都是很钦佩的。我还记得您组织的一个会议系列，大家称之为“神仙会”，吸引了许多老师和学生参加。这个会最初是哪一年开始的？

卓：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大概始于 1998 年吧。

黄：一共是组织了十几届吧。

卓：第一届应该是 1998 年开始的，是我组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的第一次亮相。

黄：此后是每年一届？

卓：基本上是每年一届，有一年开过两次会。

黄：出了多少集会议论文集，就意味着办了多少次会议？

卓：办了十多次会议，大概是从 1998 年开始，2012 年就不再举办这类会议了。

黄：我是 2003 年认识您的，就是您到芬兰去参加我们赫尔辛基大学召开的那个“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国际会议。

卓：对的，应该是。后来我们也邀请过你们大学的教授与会。

黄：是不是 2009 年也开了会？

卓：是开过会，我记得是 2011 年开了最后一次，2011 年以后就没再召开了。

黄：我记得我是 2007 年第一次参加了这个神仙会。通过这个会议所搭建的学术平台，对整个中国的学者都有吸引，不仅仅是中国大陆的学者，也包括少数台湾朋友，而来自香港的学者则较多，香港学界与中国大陆学术界有很密切的联系，也包括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推动了华人学者对基督教的研究。我可能就参加过差不多三届或者是四届会议，我可能是 2007 年、2008 年、2009 年参加的，对吗？

卓：2010 年也开过会。

黄：2010 年也开了？那一年我也参加了吧，我好像每次都参加了。对，那我参加了四年的会议，即 2007 年、2008 年、2009 年、2010 年，2011 年好像就没有了会议了。

卓: 2011 年也召开了会议, 还出版了会议论文集, 可以进行查验, 这样看来会议开到了 2011 年。

黄: 到 2012 年就没有了吧? 那我一共参加过五次会议, 即 2007 年、2008 年、2009 年、2010 年、2011 年的会议。

卓: 到 2011 年开了最后一次会议。所以, 一共开了十几次会议, 从 1998 年到 2011 年就有 14 个年头, 至少有 15 次会议。

黄: 我们当时就觉得, 这个会议对于全国基督教研究领域学术力量的整合和青年人的培养, 都是很重要的。另外, 出版这个基督宗教研究丛书, 还有您们所的《世界宗教研究》, 《世界宗教文化》等学术杂志, 是不是与您也相关, 研究论文主要是在这三个刊物上比较多。

卓: 《世界宗教研究》由我主编, 具体工作是编辑部的同仁在做, 《世界宗教文化》以前我也比较关照, 后来另有专人负责了。我的工作可以分为两大块, 一是我个人的学术研究, 二是后来就主要涉及学术组织工作。我个人学术研究前后到去年为止好像共出了 32 本书, 后来从学术研究转向学术组织工作, 就是出版丛书、组织会议等, 耗费了我的主要精力。我担任副所长后最早于 1994 年和爱德基金会合作组织过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以“基督教文化与现代化”为主题, 这是我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此后我还和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所的吴小新博士合作在北京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基督教研究国际会议, 与美国伯克利联合神学研究院也合作开过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这样就形成了系列学术会议。我基本上是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我组织了基督教的研讨会, 包括每年一次的神仙会, 基本上是基督教研究专业领域的学术活动。另一方面, 则是我作为中国宗教学会会长而组织了全国的宗教学术研讨会, 包括每年中国宗教学会的年会, 也还组织过“中国宗教学 50 人论坛”。学术涵括面应该很广。

黄: 您作为中国宗教学会会长是哪一年?

卓: 我想, 应该是 1998 年以后吧, 是在当所长以后, 所以, 会长也当了十多年了。我们研究所在当时有一个不成文规定, 谁当所长, 谁也就当中国宗教学会会长。我于 1998 年开始当所长, 所以, 估计在 1999 年以后就当会长了。从我当会长起, 我也组织每年的中国宗教学年会, 这样就不仅是把基督教研究加以整合, 而且在中国宗教学方面也开展学术研究的合作, 组织各种学术会议。所以, 在组织学术会议上主要就是这两个大的系列, 其规模也还是比较大的。

黄: 您们组织的宗教学年会我好像没有参加过。

卓: 中国宗教学年会的定位是属于国内会议, 这样的会议对您的身份而言就跨界了, 但召开国际会议时我们也会请外面一些人来参加。中国宗教学会议有时候是我们的工作会议, 理事们一年碰一次头, 附带有些学术讨论, 但重要的是每年要商量一些学会的具体工作事情。全国宗教研究机构、高校相关专业、以及相关党政部门对宗教学都非常关注, 所以, 我们中国宗教学会的结构也比较特殊。通常由我们研究所所长担任学会会长, 我所副所长则担任常务副会长。此外, 重要高校宗教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有关省市宗教学会的会长、宗教界的领袖人物和党政部门的相关领导也会担任我们的副会长。例如, 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副局长, 中央统战部负责宗教工作相关部门的领导, 各宗教全国协会的副会长, 以及相关大学的校长、宗教研究院的院长, 一般也可能当选为我们学会的副会长。因此, 大理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 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山东大学宗教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宗教研究院等大学宗教研究院的负责人, 都是或曾经是我们学会的副会长。我们最年轻的副会长, 只有 40 来岁, 所以, 学会不断增加新鲜血液也挺好。

黄: 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谈基督教的神仙会, 还有和不同机构合作的这种学术会议, 另外, 好像您们还组织了一个中国社科论坛, 这个会我也参加过几次。

卓: 中国社科论坛是我们院出面组织, 由各研究所以分论坛的形式具体操办的。这是我们社科院开展创新工程以后在最近这几年才开始实施的。

黄：就是 2010 年之后或者 2012 年之后吧。

卓：对的，可能就是最近这几年的发展。

黄：但您们这个牌子很响，中国社会科学论坛。

卓：是称为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我们本来是希望整个社科院来做，规模大一些，就像北京大学组织的北京论坛，上海那边组织的上海论坛那样，但是我们院比较低调，不愿意做那么大，也就只好让各个研究所来做分论坛。这样，我们也办了好几次了。

黄：这个论坛还会继续做下去吗？

卓：理论上讲应该继续坚持，只要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这一选项还继续做的话，而且还有一定的资金支持，那么我们当然也就继续开下去吧。

黄：我看到最近您们也 and 北京市基督教两会合作举办会议，这好像是有几年的事情了，也就最近几年吧？

卓：我们以前曾跟爱德基金会合作过，开过两次会，现在我们也和北京市基督教两会合作，也就开过两次会议，合作的时间还不是很长。

黄：好的，除了这个办刊物、出丛书，以及组织学术会议这样几个板块，另外您们还有培养学生这方面的发展吧？

卓：培养学生是由我们的研究生院整体策划，我们所在其中有个宗教学系，在我当副所长以后曾经当过宗教学系的系主任，但现在不再具体负责了。由于部门不同的原因，我们培养学生很受名额限制，这对我们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就我们系招生情况来看，一般我们系每年硕士和博士加在一起不超过十个人的名额，就只有这么小的一个规模，后来才有一些博士后招收计划。可我们有这么多老师，许多都没有学生指标。所以，一个导师原则上也就只能带一个学生，除非别的专业有轮空现象，这样一个导师最多也只能带两个，可以带博士的导师基本上就不带硕士了。实际上，我们系可以带硕士的导师有 40 多人，但是我们只有 4 个硕士名额，这样大概十个导师才能有一个学生名额，而我们系可以带博士的也有十几个导师，而博士名额也只有 4 个，后来各增加了一个名额，也就是 5 个硕士，5 个博士，那么，是不是根本不能满足培养学生的需求？这样，我们只能根据考试的情况来灵活掌握。初步估计，几十年来我们系在研究生院已经初具规模，先后毕业的研究生加在一起也有大概好几百学生了吧。

黄：您个人带的博士也有不少了吧？

卓：我在研究生院带的博士大概也不多，因为每年名额比较少，约二十年来加在一起所带学生大概也就二、三十个吧。

黄：那他们大多数还在宗教研究这一行，还在从事这一行研究吗？

卓：大部分还是在从事宗教研究这一行，也有少部分改行的，还有一些存在着就业困难，越晚毕业的学生就业也越难。

黄：另外还有博士后吧，一般博士后就很少改行了，对吧？

卓：博士后也有改行的，因为现在博士后也找不着工作，如有其他机会就业则就会有改行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出站的几个博士后好像还没有改行，但还没有出站的博士后如果原来没有工作，那从现在开始就有危机了，博士后现在也找不到工作。

博士生发表核心刊物论文的压力问题

黄：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学术平台也有问题，现在很多从事宗教学研究的人员，特别是从事基督教研究的年轻学者感到困惑，他们发文章比较困难，但要评职称就必须有相应的学术成果，必须出书发文章。那您们在这个方面怎么来为大家做点贡献？

卓：难度的确比较大。最近我在微信上看到报道，就是各个学校及研究机构都要求博士生要在核

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但如果这样计算下来的话, 全国大概有六、七万博士生, 那就要发表十二、三万篇论文, 这已经占整个人文学科论文的一半数量了。而科研人员、学生的导师们也得发表论文啊! 大家都要发表论文, 但有限的期刊不可能让人们发那么多论文, 尤其是宗教学限制很多, 所以, 这个难度太大了。我是不同意这种做法的, 因为研究生在学习期间一共就三年时间, 学生应该集中精力多学点知识, 然后, 把自己的博士论文专心做好就行了, 若要让博士生写文章、发文章, 势必就会分散掉很大的精力, 而且, 现在处于在读研究生这种情况发文章也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 在这个中间过程要费掉的精力就更多了, 使学生在校三年时间得不到专业学习的集中, 而最后一年学生还要到处跑工作、找工作, 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来潜心学习。记得我在德国那五年多, 就没有发表论文这个压力, 所以, 我就有可能埋头看书, 能够比较系统地看很多的书籍。

黄: 您觉得, 现在国内在这个方面会有调整嘛?

卓: 目前看没有什么调整的希望, 但这样的话, 实际上是把一些学生的基本训练给破坏了, 所以, 我是不同意这种做法的。但有人说, 这种规定可以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其实写学分论文也同样可以锻炼写作能力的, 不是让文章非发表不可。而现在这种核心期刊形式的发表对学生们的要求难度是太大了, 试问宗教学在中国有几个核心期刊? 其他专业的期刊能否发、发多少宗教学的论文? 但我们现在也只能服从这种规定, 有了规定的话, 我们导师自己说话也不算数, 只能如实按照这个规定去做, 否则, 就会影响学生毕业。我们对这些博士生的确很同情, 但是爱莫能助、真没有办法。我们为此在不断呼吁扩大我们宗教学杂志的发行了、增大其版面。我们宗教学的杂志非常之少, 而公共性研究学科的杂志一般也不愿意登宗教研究的文章, 所以, 我们比其他任何专业的难度都要大。

黄: 所以, 这对宗教研究的学科发展也可能会有不利影响。

卓: 我们现在办了几个以书代刊的专业学术杂志, 我们努力争取为学者提供更多的发表途径。现在我们办的有部分杂志可以被承认, 甚至可以等同于核心期刊, 如《基督宗教研究》和《宗教人类学》, 但其它刊物还没有获得这种承认, 我们现在以书代刊的书籍至少有五、六种吧。两个被正式作为核心期刊的杂志即《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

黄: 所以, 我也在做这个《国学西学国际学刊》吗? 我们做的还不错, 现在国内有一些把我们算 B 刊来。

卓: 我们对这一刊物还不承认。

黄: 是吗? 我们刊物加入到托马森路透的那个叫做 ESCI 的类型, 它们中有不少是被作为 B 刊的, 在国外它们中很多杂志甚至被作为 A 刊的。

卓: 我们这里就是情况不同。

黄: 您们是什么? 就是 A & HCI, SCI?

卓: 不是, 并不是光认这个, 而是指明在相关领域有哪些、哪些学科和哪些期刊为核心期刊, 这一类很少, 我们实际上只有三个专业研究的杂志可以被视为其内, 即我所的《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 以及四川大学办的《宗教学研究》这三个杂志。其它杂志能否被承认则要看具体地方或部门的态度了。我们被承认的其它刊物只能是所谓地方粮票, 即只有社科院承认, 但在全国范围却不一定算数。当然, 如果您能在其它公认的那种学术刊物上、就是大家都认可的核心期刊上发文章也算, 但那些期刊绝不会轻易地发表宗教学的文章, 其难度比较大。

黄: 就是不知道这套体系会不会改变, 这对人的约束真是太厉害了。哪有那么多真正懂的人, 那些管职称的人不一定懂专业, 就只看发表的文章是否在有这种招牌的杂志上。

卓: 这实际上就是注重外包装, 而把它的实际内容却忽略了。

黄: 我们在外面评估最主要还是看您文章的内容。

卓: 应该是看内容, 而不是发表的杂志, 但人家就不看内容, 这也没办法。

三、您怎么来看这个基督教研究的现状和未来,以及您的期望是什么?

黄:想谈的主要就是这几个方面。已经讨论一个半小时了,我们现在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怎么来看这个基督教研究的现状和未来,以及您的期望是什么?我们此前已经涉猎到了一些,现在可以更深入地展开来谈。

宗教研究的脱敏是中国发展的必需

卓:我对于现在宗教学的学术发展应该说是比较担忧的。到现在有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了,体会到宗教研究的困难。这种状况其实是与我们国家发展的总体态势不相符合的。为什么这么讲?一方面中国现在的GDP是世界第二,因此,中国现在强调要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而这个世界很大,这个舞台上有着各种各样的民族和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宗教者是占了世界人口的84%,有这么大的比重,您在进入世界中心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它。既然要进入世界舞台中心,那就应该研究宗教,而基督教有信仰者23亿人,占全世界人口将近1/3,所以,对基督教的研究就应该加强。而我们由于过于强调宗教敏感,反而是在回避对宗教的研究。面对这一国际形势,给我们的宗教研究带来很多困难本来就不应该。当然,我们要想破除这种困难,必须付出很艰辛的努力,能够取得很小很小的成果都是来之不易。我的希望就是,整个宗教学术研究的氛围能够有所改善,不要把我们宗教研究者也看成另类。这就需要中国整个社会对宗教的理解,要更加科学、更加客观地对待宗教。如果要想真正地放眼世界,就不能回避宗教问题。

黄:所以,这是我们所处的一个大的现状,国家发展趋势的现状与我们现在宗教研究的实际状况出现了一个反差。

基督教中国化是其在中國生存和发展的必需

卓:要打破这种僵局,我们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说,我们强调宗教中国化,尤其是从基督教中国化做起,因为基督教是与西方社会联系最密切的宗教。全球基督教的力量有这么大,而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与西方的问题也是最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的存在和基督教的研究夹在这二者中间更是步履维艰。如果要打破这种局面的话,那就必须从基督教的中国化做起,使基督教真正成为一个中国的宗教,适应中国社会、而且被中国社会所理解和承认。为此,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但也遭到了很多的批评。比如从基督教这边来说,有人坚持认为,基督教本身就是普世性的宗教,为什么强调它的中国化?我曾解释说,这种普世其实是抽象的,而它的具体存在都是处境化、在地化之状。就中国的“处境”和“在地”而言,那当然就是中国化了。所以,要这样结合来看,基督教既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而对于在中国的基督教来讲,也只有首先是作为中国的宗教,然后,才能体现这种世界宗教的在地化展示。

黄:我们讲的处境神学(Contextual Theology)一直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所以,这个中国化应该就是与这个处境化一个样的。

卓:对宗教存在的国际社会来说,应该对我们的宗教中国化方向、特别是基督教的中国化发展要有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但现在发现批评声音也比较多。所以,从国际、国内的形势来讲,中国的基督教存在和整个宗教存在都需要得到客观、公正的理解。我们的基督教研究及其中国化研究,应该是颇有希望的一个突破口,在这方面,如果能够做好工作,慢慢使社会能够正视学界的客观研究,正确面对中国的宗教和基督教存在,也就是我常说的能够真正做到使宗教脱敏,那么,这个局面就会有巨大的改观。

现在宗教在中国确实是敏感话题,不少人谈宗色变,一提到宗教的话大家也都不敢去碰,这其实

根本没有必要。如果社会能够正确对待宗教及其研究,那么,对我们的学术出版、学术会议的召开、包括对我们学者的身份认同,都会带来很多好处,减少本不必要的困难和麻烦。因此,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尽早破这个局,帮助我们走出困境。

黄:正好我昨天看到微信群里面有某个大学发通知,不让学生过圣诞节。

卓:这还是社会方面对宗教的误解在起作用。对我们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不少人其实并没有认真学习和正确理解,所以,这方面所出问题有时候是超出学术之外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处理。但是。我希望这种状况今后能够得到根本改变。现在的形势发展需要我们更多地了解和研究宗教,而不是对之回避。希望当下的困难和难题是暂时的。

黄:从我的观察来看,全国的宗教研究学者,比如说各地大学、学术机构的学者,他们主要的希望好像都寄托在您们身上,基本上都是看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和中国宗教学会的作用。

大家应该关注和争取落实国家领导人和政策为宗教学的发展所提供的机遇

卓:所以,我们的压力最大,我个人的压力也比较大。对于宗教的正确理解和宗教学研究的必要性,我都是据理力争的,希望能把宗教学作为一个重要学科领域发展下来。

但是,我们自己也有潜力可挖,应该更加积极主动。习近平主席在 2016 年“5·17 讲话”中提到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需要大力推动的重点学科中就包括了宗教学。而在 2017 年落实习主席的讲话时,中央领导在论及的相关重要学科中也强调了宗教学的学科体系。这对我们学科体系发展是非常好的机遇,我们应该及时组织研讨会来积极呼应、积极紧跟,但在这方面的力度还很不够,一旦机遇失去则很可惜。所以,大家在关键时刻不能光看我们世界宗教研究所,更不能光看我一个人有什么作为,而必须大家共同努力。为此,我也希望我们学界不要太麻木,对于有着重大意义的讨论不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应该积极参与。宗教学的事业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业,应该靠共同的努力来维护它,把它发展好。不过,这种发展不能走西方的老路,而要体现中国的特色,要有我们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有我们的体系,有我们的学派,有我们的认知经验。

黄:我简单总结一下,您提到宗教学整个大局和世界形势发展的局面,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当前发展中都占有很重要的比重,中国要成为这个世界大舞台的核心成员,就是说要想起到引领作用,那么,中国就需要正确面对这个宗教问题,不然,就没有办法去有效引领别人。这是一个大局观念,但很多人却不理解,对宗教问题的误判和不正确做法会使我们的国际发展受到很多束缚。我们在寻找突破口,其中基督教的中国化就是一个关键问题。第二个就是政策问题,中国主要领导人对这个宗教研究的政策是积极的,其实给了一定的发展余地,这两个方面应该多加关注。

卓:这样,我们就能够主动争取到一个更好的学术研究氛围,有的学者不是太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黄:这其实也是个战略问题了,是很重要的。讲到这两点,我也想谈点想法,第一点就是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我注意到您也讲过,就是要有各种声音,那么,我想指出主要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基督教的中国元素和基督教的所谓普遍性、本质性的元素之间会不会产生张力,以及会不会发生一个要取舍或放弃什么东西的问题。有关的批评者可能是担心这个问题,怕把基督教中国化之后就使之最后不再是基督教了,可能他们是有这方面的担忧。那么,这两个方面,怎么样来使之协调好?我正好最近在研究马丁·路德,我就觉得马丁·路德的思想在这个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上应该能够做出贡献,它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源。这就是路德他所说的两个国度,即属世的、世俗的国度和上帝的国度。今天早上我在中央民大游斌教授那里跟他的学生在一起,我就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按照马丁·路德所讲的人论,就可以加以发挥。他把人分成肉体、魂体、灵体,或者叫作肉、灵、魂这三个方面,这个俗世的国度和政权管的就是人的肉体、即物质和有形的这个方面,而教会则讲信仰,管的是人的信仰、即人的灵体或关涉永恒性的方面。至于中间层面就是魂的层面,就是所谓道德、伦理、幸福这类东西,相当于一个交叉领域,这就是两个国度都会管到的。如果是在基督教中国化这种状况下,

那么可不可以讲,让这两个方面都能够来仔细地界定和划分自己的管辖领域。如果用这样的一种方法,能不能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思考做出一些贡献?因为我自己是在北欧生活,故有此思考。卓老师您也到北欧去过,知道那边的情况。北欧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社会非常的和谐,而且其宗教关系也非常的和谐。在这个背后就是路德的这一思想在里边起了很重要的影响。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个基督教中国化究竟怎样体现的问题。路德的这个思想不仅仅触及一个政教关系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到伦理,涉及到信仰问题。他对二者有一个很重要的划分。我想,可能对于基督教的中国化,无论是推行者还是批评反对者,在这里边可能都存在有一个界定不清或者产生了误解的问题。如果没有误解,应该说所有的基督教都是一个处境化的基督教。基督教在不同的处境里边,就会有不同的表现。但是除了这个处境里面的具体特征之外,基督教总体上的中心词就是叫基督教,无论什么化,无论是什么国家、什么地区的基督教,我觉得它的本质仍然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福音和人的灵性方面的问题。于是,我曾在你们的社科论坛上第一次提出这个观点,后来又用英文写成了一篇文章,我将之叫作代表“基督教中国化途径之一的魂体神学”。就是从肉体、灵体、魂体这三个角度来看基督教的处境。我想,这就是对您刚才所说的基督教中国化这一问题的回应了。注意区分“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原则,当然我们也是在探讨。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您讲如何对待国家或者党的政策的问题,以及对最高领导人相关讲话的回应,这确实是为宗教学的可能发展提供了一个空间和机遇,但是只有学界、最起码是宗教学界积极回应,大家共同努力,才可能抓住这个机会来推动宗教学的发展,使这个学科能有这样的进步。我也但愿中国在当下能够像您刚才讲的抓好这两个方面。

卓:您所考虑的这个解答从您自己的认知处境方面来讲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中国社会的存在和文化处境和您所处的那种处境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种比较的意义来看,应该说我们还必须有一些另外的思考。

首先,我认为基督教的中国化与基督教作为一个世界性宗教并不矛盾。基督教的世界性不是抽象的,而是从它的地域性发展逐渐体现出来的。例如,基督教早期阶段的特点,主要就是亚洲文化即犹太文化及其涵括;而在其走向成熟、为其体系奠基的阶段,则体现了罗马帝国的文化,从而开始与西方文化挂钩,成为西方的宗教。而从天主教的大航海时代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时期以后,基督教就真正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世界宗教并不是清一色地在每个地域一成不变地存在,而都有其地域的特色。比如说在其语言表达方面,就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本土化的需求。这种世界宗教进而也会关注甚至参与当地的社会政治进程,这在中国也并不例外。而当我们在中国回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历史时,显然能清楚看到基督教传教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巨大成功,但这也给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些阴影。正因为如此,所以,基督教的中国化进程就有着更大的紧迫感。我个人认为,如果是对基督教抱有良好愿望的人,就应该支持基督教的中国化。我想,基督教中国化与之保持世界宗教的存在根本不矛盾,而且确有这种必要。其实,基督教中国化最早就是教会自己提出来的。实际上,中国教会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新教,都提出过中国化的必要,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提法,只不过是延续历史的这种思路而已。

第二,基督教中国化与其它宗教在中国的中国化,都有一个社会存在的必要。实际上,中国化最早的不是基督教,而是从佛教开始的。历史上,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这种中国化的演变进程。中国化在中国主要是体现在两大层面,一是政治上,二是文化上。

政治上就是宗教必须跟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相适应,应尽量融入其社会建构之内。这就是我们说的,政府现在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政府已经有了这个姿态,故而需要双向互动,即积极引导与积极适应的互动。审时度势,宗教也应该主动去适应其存在的社会。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宗教在文化上的中国化,宗教要适应中国文化处境,真正接地气,由此则可从中国文化的相关元素中使自己得到不断的充实。这也是辩证的双向互动,在宗教在中国文化中充实自己的同时,中国文化也从相关宗教中为自己增加了新的内容。中国文化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不断开放、不断吸纳、不断丰富成熟的。从这个方面来讲,中国文化体现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胸襟。基督教的一些优秀元素完全可以融入中国文化,参与中国文化的革新和创新发展。一方面,外来宗教可以向中国化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来充实自己的信仰,另一方面这些宗教信仰也可以把其自身的积极因素充实到中国化之中,使中国文化发展也能够有一个更新和深化,所以,这就是双赢。

由此而论,中国化在政治或在文化这两个层面对基督教也都是必要、有益的。

基督教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经验教训,比如,我们讲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在当时的处境下,西方社会封锁中国,西方的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会都一边倒地抵制、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中国持有否定和批评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如果站在西方社会及教会一边与新生的社会政体即红色政权相对抗、采取抵制和抵抗之态,那其面临的将会是灭顶之灾。而中国教会开展三自爱国运动,就必然是一种政治选项,即与西方社会和教会彻底摆脱关系,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基督教与新生的红色政权相适应,那么,就是一种政治上的中国化表态,而这样的占位表达也就得到了中国政治、即其政权政府的支持,使之获得新生,并且能够发展到今天。

很显然,宗教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其社会存在肯定会受到政治的影响,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参与政治。至于宗教是什么样的政治态度、参与什么样的政治,当然就与其命运密切相关。

这在西方基督教的历史上同样如此,仅从欧洲宗教改革谈起,当时政教分离后的真实状况就是“教随国定”、“在谁的领地,信谁的宗教”。这就是基督教的政治适应。政权的力量之决定性和影响力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年4月5日—1679年12月4日)的名言中就可体悟,他在区分宗教与迷信时就断言:凡是被政府肯定的信仰就是宗教,凡是被政府否定的信仰就是迷信!这也是政治。

英国宗教改革建立的圣公会就称为国教会,其与天主教的根本区别就是不再让罗马教宗当其最高领袖,而英国世俗君主即英国国王则称为其教会的最高首领。这也只能用政治来解释。所以,历史上的基督教并不是清高到不问政治的宗教,而是与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都有极为复杂的卷入。

这种情况下让中国的基督教不问政治、不再参与政治,有可能吗?因此,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政治卷入,尤其是其以往历史的复杂性,我们要特别关注和特别小心。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史上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有过许多错误的选择和卷入,因此基督教的中国化不仅必要,而且基督教还应该在当代中国先行做出其中国化的表率 and 榜样。对于基督教而言,其中国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比其它任何宗教都要更大。如果我们要对基督教加以透彻认知的话,就应该关注其在中国社会处境中的认知,反思其历史上的相关表态和亮相。西方政治是不完全认同中国政治,但中国基督教则理应认同中国当今政治,否则让其保留 1949 年前的认同、继续对西方政治的认同,岂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另外,从积极方面来说,在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基督教思想可以得到提拔和升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要落实中国的神学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的神学发展。您看我们当今世界的神学,有西方神学、也有第三世界神学,即亚洲神学、拉美神学和非洲神学,这些神学本身就是有地域特色的,是从其本土产生的。那么,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中国神学,也是体现其中国化的一项重要理论建设。我想,世界基督教对我们的这一倡导也应该是支持和理解的。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我觉得中国基督教在当前推动的中国化是理论与实践上都说得通的,包括对其教义信仰传统而言也都是说得过去的。我们可以追溯《圣经新约》中的保罗思想传统,他对基督教的本土适应及生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故此,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纠缠、去争议基督教中国化是不是具有争议性,是否会违背基督教的普世性,等等,我们应该积极去做的,则是对之理解,并积极地参与、

全力去支持。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基督教与整个世界的发展形成积极的、良性的互动。如果仍然纠缠于对之猜忌、怀疑、甚至是批评，那么彼此的差距会拉大，相互之间的张力也会加强，但这完全没有必要。这就是我的基本看法。

黄：这很重要，这也是我自己在思考的问题，其实，在很多方面都与您是相吻合的。我想，这里有个处境神学的问题，所以，基督教的中国化从理论上来说、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来看，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则是，我把这种本土化思考称为政治神学，就是在具体的语境中来处理宗教与相关的政教关系。无论持有什么样的态度，这都是一个不可避免、且必须处理好的问题。这就是政治神学。在我刚才所讲的路德思想的时候，即他关于两个国度的思考，其中都提到了对于相关政治的必要尊重和认可。所以这第二个就是政治神学的问题。

那么，第三点就是文化神学的问题。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对基督教会的评价曾有“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之说，而现在就可能不这样了。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在政治层面已经坚持做了几十年了，那为什么现在的基督教仍然没有被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所认可、没有被其视为是自己的宗教信仰？这很值得我们思考，更说明基督教还仍然需要继续努力。

卓：已经有更多的人认同，但是还没有达到全部认同，甚至还没有达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所以，还是要继续努力，至少要达到相对而言有着普遍认同。

黄：对。所以，这个文化神学方面也是一样的。在我所讲的这个体系中就有属于灵和魂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体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慈善，或者说，对人的这种关怀在教会里面是比较具体的，就是对人的身体、医疗、教育、慈善等等方面的关怀。我在我所提出的“魂体神学”中采用了一个方法，旨在伦理、道德、文化认同这些方面的关注，属于魂的层面，那体的方面就是指在物质的、身体方面的慈善行为。这个政教关系或者政治神学可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您觉得，是不是批评者也是在这一点上无法认同？我所讲的只是担忧或者怀疑。

卓：您强调的是一种内涵式的理解，而在中国，这个内涵式理解的任务则是交给中国基督教会自己来完成。我作为一个学界成员，主要强调的是一种外延式理解和从外往里的观察。正是在这个外延方面就会与社会、与政治产生一个积极的互动，如果这个积极互动能够成功，那当然就可能构建起我们中国特色的政治神学。但如果在这方面不是很成功，则可能会形成更大的张力和对抗，而这样对谁都不利，不是双赢而乃俱伤。所以，我们可能要更多地从这个外延式角度来考虑，要有外界的敏锐观察和及时提醒。

英国政治哲学家在观察社会时曾警告大家，当只有一个人或极少数人洞察到社会的疾病时，这时的疾病比较容易治愈，但大家都不以为然；而当大多数人都能够清楚地看到这种疾病时，社会则已病入膏肓，根本无法治愈了！哲学家就是观察者，我们学者就担负着冷静、客观、及时、准确地洞察社会的任务，会更多地从社会与宗教的关系层面来审视。我们当然也希望中国基督教会有一些在内涵式考虑方面的突破和创建，但这不是我们学界的主要任务。我们只是社会与宗教的观察者和警醒者。

黄：其实，我思考这个问题也是很久了。差不多就是在中国举办奥运的时候，大概在2008年或2009年的时候，我就提出了“大国学”的理论，后来还出了两本书，叫做《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对话神学》和《汉语学术圣经学》，加上所写的一本《汉语学术神学》，共有这三本书论及相关问题。

卓：其实，国学这个概念本身在中国学界就是有争议的，所以，对于这个大国学，中国大陆有不少人认为表述比较模糊，其内涵不清，故外延无限。

黄：所以，我想一应该正确理解国学，二要解构狭隘的国学理解。我为此要讲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从文化神学的角度来看待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我认为，基督教应该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从政治界定上来说，在中国被列为宗教的只有五种，而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西方都被当成一种宗教，但

在中国却被分成两种宗教,并具有法律和政治上的合法性。

卓:这不完全准确,我们只是将之称为“五大宗教”,就是说比较大的宗教就是这五个,但还有一些小的宗教在中国也是被承认的。

黄:好,您的这个纠正很准确,是德国传统的精确思考。另一个问题则是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基督教,其传入已经有 1300 多年了。这一次来北京我正好和清华大学的朱东华教授在一起,我们合写了一篇文章,我想要研究基督教育在华历史的悠久。我最近找到了一个重要文本,即路德评论聂斯托里(Nestorius)的,有 30 多页纸的篇幅。从路德的观点来看,聂斯托里根本就不是一个异端。按路德的说法,聂斯托里这个人只是因为逻辑比较混乱、语言表述较差,本来是想讲讲正确的道理,却被人当成了一个异端。

卓:马丁·路德的这篇文章,是宗教改革前还是宗教改革后写的?

黄:1539 年,是发起宗教改革运动之后。

卓:那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当时创立的新教也被天主教看作异端嘛。

黄:对,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提到我那个大国学的理论。到现在为止,我开玩笑说我也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但我觉得一些口头讲大国的人却没有自信。因为我讲到中国的宗教好像是“一首两翼四足一尾”的飞龙,“首”就是从以前的皇帝到现在主导中国的政治权威,然后有“两翼”,这就是外来的宗教文化和本土的宗教文化,而“四条腿”我觉得就是本土的佛教、儒家、道家和本土的民间宗教。这里面既有由外来而本土化的元素,也有普世性的元素,而从外来而进入本土化过程之中的,就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们本来是外来的,但仍然还在努力,想要实现其本土化。此外,再加一个“尾巴”,则是指比较小的文化元素。我的这个理论想要解决两个问题,从政治神学上来说,基督教作为这个身体中的一个部分,存在应该对之怎么处理的问题。不同的学者对之有不同的观点,但我认为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说是需要处理好的。我提出这种大国学的理论,基本目的之一就是为解决其中涉及的这个政治神学的问题。此外,还有文化神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基督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就像现在科学、世俗主义等也被包括在内那样,而它们的历史都更短。我要做一个现象学的描述,而且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学,不是唐宗宋祖的国学。所以,就得要研究这条飞龙。这个一首两翼四足一尾的飞龙,是从我所说的这个政治神学和文化神学来考虑的,我就想提出研究这种问题的必要性,当然不同的学者对此可以有不同的观点。我写那个大国学是强调对话,有一个汉语学术对话的问题,如基督教和中国的对话是很丰富、很大的体系,由此就联系到这个中国化的问题了。

卓:您的这种愿望是好的,但是您所做的这种图像描述,在不少人看来却有些问题。

黄:龙是中国的象征,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这都是积极的图像嘛?

卓:但你的这种描述让人家往往看不出中国传统对龙的形象所公认的认知,你参加过好几次研讨会,大家都对之提出了一些批评的意见。其一,在这个整体图像的构成方面,你可能还得了解中国人的心理,对你的描述能不能承受得了。其二,你对不同的宗教怎么来定位,如何来看待相关宗教也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有的人觉得你与他们在信仰的定位上不同,认为你的定位不对,故而对你提出了抗议,你大概也听到了。

黄:那次争论是在兰州会议上,我对龙的描述是我的最初版本,我觉得我后来对这一龙的图像有了改进。

卓:但问题的关键之处是你把相关宗教搁在哪个位置,信仰这一宗教者的心理感受如何,能不能认可或接受,觉得搁的位置合适不合适,这是你必须考虑的。

黄:我现在已经修改了,已经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放在平等的位置了。

卓:所以,就是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如何? 我们也要了解清楚。

黄:我估计,放在我现在这个体系中,应该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还是有这方面的思考。

对宗教学未来的期待

黄：好的，我还想问问您对于未来还有什么期待？您们的宗教学会是否可以发挥什么优势，比如可以组织全国高校的学术会议来解读国家的宗教政策、或者领导人的相关思想，以及执政党的宗教理论？

卓：我们每年都开会嘛，所以说并不是没有主持、组织过这样的会议。

黄：那么，您们能不能把您们的想法作为相关提案来提出呢？

卓：这样的提案以前就有过，前不久我们在山东还专门与山东大学合作召开如何推进这类提案的会议，并希望相关人士做出这样的提案来提交相关部门。但是否能被接纳就要看整个社会的氛围和国家的决策了，就是营造这样的社会氛围都不是容易达到的，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舆论场的形成要靠大家共造舆论，如果不去造舆论就没有这个场，是不是？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现在社会上的观念是多元的，你的这种声音没有，其他的声音就起来了，而且会影响到整个舆论场，形成相应的社会导向。

黄：但您除了担任这个宗教研究所所长和宗教学会会长之外，还是全国人大常委啊！您还曾参加政治局常委关于宗教问题的集体学习。对这种身份，我们以前可称为国师啊。

卓：但就是这次参与学习也被人作为一个批评我的口实。您可能对批评我的文章看得还是不多，现在对任何事好像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您刚才说到所谓社会身份的问题，其实对我的批评者中有一些人的身份比我更重要，在中国的社会地位远比我更高，所以，社会公共舆论很重要。我们宗教学领域的很多同仁就觉得有您那样的地位，您一个人说话就足够了，这种争论不管我们的事。但恰恰相反，一旦形成负面舆论，整个宗教学界的日子都不好过，并不是仅仅波及某一个人。因此，在不同的位置，都要发出不同的声音，对宗教学的维护和推动大家守土有责，人人都应该义不容辞，不可说只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认为，自己还是尽了责任，在关键时刻没有退缩。但是，大家在抱怨宗教学研究氛围不好的时候，也应该冷静想想自己负有多少责任，自己是不是尽了努力？所以，宗教学的研究、对宗教的正确理解，这是大家共同的责任，而不是某一个人、在某个位置、某个角色上才有责任。

黄：孤掌难鸣，其他人如果不跟上的话，其实，最后受到伤害的还是所有人。

卓：就是这个问题，最终所有人都可能会受到伤害。最近有些学者就遇到了麻烦，受到了莫须有的指责，一下子就感到了压力。

黄：但是在十九大之后，宗教学研究总体上来看形势还是可以的吗？我们还是可以积极解读十九大的政策的吗？

卓：当然，顶层设计很好，但是，今后的具体工作还得大家做。现在各种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观念并没有停止，争论还在继续，是不是？

黄：中国这种开放的大局、大方向是不会变的吧？

卓：是的，所以，我们要顺应这个形势，要积极有为，如果不作为的话，那大好形势也会丢失的，也会变化的。

黄：可能大家还真不知道有这个道理，认识上有差异。

卓：所以，大家可能要更多地关心一下现实，特别是现实社会的宗教研究，而不能只是自己埋头做自己的那种纯学术。如果没有这种好的氛围支持，是做不好纯学术的，甚至根本就做不下去。

黄：所以，我刚才也讲到平台搭建的重要。

卓：平台要靠大家共同搭建，是不是？如果没有这个平台，谁也唱不了这场戏。

黄：而学这个专业的，学者发不了文章，职称也就评不了。

卓：对，学生毕业找不着工作，这个专业也就萎缩了。尤其是优秀人才也就不来这里发展了。

黄：我现在也能做一点工作，基于这种状况，我办了两个刊物《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和 Brill

Yearbook of Chinese Theology, 希望从外面为大家打造一个学术平台, 提供发表学术成果的更多机会。您觉得还有想补充的?

卓: 没有了。

黄: 好的, 那非常感谢卓老师! 我们两个人差不多聊了三个半小时, 到时候我们整理之后再发给您, 请您修改, 既可以补充、也可以删减。我正在编辑自己所翻译的路德那六本书, 还在排版之中。我想等这套书出了之后在明年能否开一个研讨会, 到时候也希望卓老师来参与。谢谢, 那我们就谈到这里。

(黄和卓分别修订了对话稿, 2018 年 6 月 4 日)

English Title:

A Dialogue o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Religious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uthors: Paulos Hua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Shanghai University, Ph. D. and Th. D. from Univ. of Helsinki, Post-Doctor from Univ. of Tokyo, Chief editor f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www. SinoWesternStudies. com) and *Brill Yearbook of Chinese Theology* (www. brill. com/yct). Email: Paulos. z. huang@gmail. com.

Xinping ZHUO, Fellow of CASS, Researcher at Institute of World Religious Studies,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of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Religious Society, previous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World Religions. Ph. D. Munich University, expert on religious studies, Christianity and Marxist religious theory. He has published or edited over thirty books, and has over 200 academical articles. Previously chief editor of *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s* and of many academic series. Email: zhuoxp@cass. org. cn

Abstract: This dialogue was conducted on December 18, 2017 at the Institute of World Religions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in Beijing. There were three main parts.

1. The key events and elements that influenced Zhuo to choose an academic career are mainly his family background and his education experience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When religious studies were still sensitive, Zhuo had the opportunity to get familiar with the subject and started his studies in a master degree program at CASS. Finally, he went to Munich University to pursue his Ph. D. (1983-1988) and received a strong edu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s and methodologies of religious studies.

2. Zhuo's career in religious studies as a scholar and leading academic organizer. 2. 1 Zhuo has studied and published diligently, and worked as vice director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World Religions (CASS), and was also chairman of Chinese Religious Society for 25 years. 2. 2 Three steps in his research career: 2. 2. 1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religious studies in the West, with published works such as *China und ihre Bezugnahme zu Religionstheorie des Westens* (Peter Lang Verlag, 1988), *Religions and Cultures*, *On the Origin of Religions*, *An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in Western Religious Studies*. 2. 2. 2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the system of thought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with published works such as *Biblical Appreciation*, *On Christianity*, *Contemporary Protestant Christian Theology*, *Contemporary Catholic Theology*, and *Record on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2. 2. 3 The strategy of studies on religion in China,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ized relig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with works such as *An Exploration on Marxist Opinions on Religion*. 2. 3. The leading academic organizer working to construct a religious research platform as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Religious Society, organizing conferences and publishing,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system of doctoral student training in China.

3. A reflect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of religious studies in China. It is primarily necessary to get rid of considering religious studies to be a sensitive disciplin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Sinicize Christianity in China. Scholars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pure academic research, but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and address the policy need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as to fi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Thus, realistic social research is important, otherwise, it is difficult to continue with studies on religion in China.

Key Words: religious studies, sensitive, Christianity, research platform, realistic social research

本期是教父研究专刊,共刊发如下论文。

在“人学、神学与国学”栏目收录了浙江大学陈越骅的“哲学何时变为宗教——早期奥古斯丁忏悔的逻辑”和北京大学徐龙飞教授的“法的开端——论罗马法的基督教教化及其对当今法学思维之意义”。

在“实践神学与中西教会和社会”发表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张秋娟的“文化异质性视角下的宗教多元主义”和德国波恩大学贺腾的“奥古斯丁论意志与罪”。

在“中西经典与圣经”栏目发表了中山大学田书峰额“亚里斯多德伦理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和江璐的“《名理探》与《穷理学》关于逻辑推理的讨论”。

在“教会历史与中西社会”栏目,我们发表了香港中文大学任卓贤的“维克托利努斯对奥古斯丁三一神学的影响”和浙江大学朱振宇的“魔鬼之城:但丁的地狱”。

在“比较宗教文化研究”栏目,我们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张迎迎的“根特的亨利和注定失败的光照论”和中国人民大学孙帅的“加尔文三一论与教父传统”。

在“书评与通讯”,我们发表了中山大学蒋佳的“新托马斯主义思潮和教会权力话语变动”,浙江工业大学陶杨华的“爱欲的分野与历史实在的生成:“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二元历史架构探源”,和鲁汶天主教大学马明宇的“亚里士多德式逻辑关系与对偶性关系的异同:从传统正方形到布里丹八边形”。

This number is a special volume to Patristic Studies in China.

In the column of Humanities, Theology, and Chinese National Studies we have published Yuehua CHEN's (Zhejiang University) "When did Philosophy converts to Religion? Early Augustine's Confession before His Confessions" and Longfei XU's (Peking University) "On the Horizon (Origin, Beginning) of the Right: About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Ius Romanum and his Meaning for the Contemporaneous Jurisprudence".

In the column of Practical Theology and Sino-Western Views on Church and Society, we have published Qiujuan ZHANG's (Beijing University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John Hick's Religious Pluralism in a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eterogeneity" and Teng HE's (University of Bonn) "Augustine on Will and Sin".

In the colum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lassics and the Bible, we have published Lu JIANG (Zhongshan University) "The Treatment on Logical Reasoning in Mingli tan and Qiongli xue" and Shufeng TIAN's (Zhongshan University) "The First treatise on Aristotelian Ethics in China and its Origin".

In the column of Church History in the West and in China, we have published Colten YAM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rius Victorinus' influence on Augustine's Trinitarian theology" and Zhenyu ZHU's (Zhejiang University) "Dante's Hell as Civitas Diaboli".

In the column of Comparativ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Studies, we have published Yingying ZHANG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nry of Ghent and the Doomed Failure of Divine Illumination" and Shuai SUN'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alvin's Doctrine of Trinity and Patristic Tradition".

In the column of Reviews and Academic Reports, we have published Jia JIANG's (Zhongshan University) "The Movement of Neo-Thomism and the Ensuing Transformation of Discourse of Power in Roman Catholic Church", Yanghua TAO's (Zhejiang Industry University) "The Divergence of Love and The Genesis of Historical Reality: An Inquire into Augustine's Thesis of Two Cities", and Mingyu MA's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euve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ristotelian relations and the duality relations: From the traditional square of oppositions to the Buridanian octagons."